

## 第四章 新的法西斯主義的萌芽

“你們不要受欺騙。所謂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表現在政治經濟現象中的東西。你們決不要受欺騙。所謂法西斯主義不過是表現為鎮壓人民和使人民貧困的資本主義組織形態而已。”

路易·賽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親身參加反抗納粹的運動，在戰後以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的地位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領導者，一九四七年四月他在東京對日本工人階級所說的這番話，就是最容易了解而又非常意味深長地說明了法西斯主義本質的解釋之一。

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披着“民主主義”的外衣而出現。但是，當我們不是根據統治者的談話而是察看他們的行動的時候；當我們不為所謂恢復全國生產力的口號或似是而非的官方統計等所矇蔽，卻直接地、具體地抓住人民大眾生活本身的時候；那麼我們就能毫無遺誤地、清清楚楚地辨認出來這裏是法西斯主義還是民主主義。

### 第一節 片山內閣

#### 一 二·一總罷工後的反動和四月選舉

麥克阿瑟在下令禁止二·一總罷工後，立即命令日本政府舉行總選舉。依照這項命令，一九四七年四月日本根據新憲法舉行了地方選舉和參議院及衆議院的選舉。

這些選舉是在怎樣的環境下舉行的呢？

第一，在杜魯門主義宣言發表後，美國佔領軍在這次選舉中所企圖的是什麼，這是毫無疑問的，而這次選舉就是在那種條件下舉行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作為它的政治部代表人對總選舉的如下聲明。——“美國正如過去不得不和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東條的日本主義鬥爭一樣，今後它在世界任何地方要與之鬥爭的，就是這種反民主的、純政治的，而且是殘酷侵略的共產主義。這件事情對於現在的日本也具有深刻的意義。這次的選舉，就是要決定這種善惡。”（見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本各報）

這難道還不是對日本國民的絕對命令嗎？它和馬貴特少將在禁止二·一總罷工時，對日本全通信從業員工會委員長土橋（一吉）所說的話，是具有同樣影響的。馬貴特說：“我是麥克阿瑟司令部的總參謀長。你敢不服從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嗎？如不服從立即下獄嚴處”（勞動省：一九四七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

這次選舉是在和國際方面完全被隔離的狀態下舉行的。從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日止逗留在日本的路易·賽揚等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只會晤了極少數被准許見面的人物，他們甚至未能出席四月四日在人民廣場上二十萬日本人民為歡迎他們所舉行的人民大會。日本人民在佔領下的七年中，與唯一來訪的國際組織直接聯繫的機會都被剝奪了。至於報道給日本人民的國外消息，則是處於極端的新聞統制之下。關於蔣介石軍隊開始潰敗的消息等一點也不透露，但是關於杜魯門宣言以及附和它的誹謗蘇聯的報道，却不斷地、無窮無盡地強迫灌輸給日本人民。

第二，由於禁止二·一總罷工的命令而復活了的吉田內閣，曾發佈通告，把二·一總罷工後的個別罷工也看做二·一總罷工

的延長，於是制止了始終實行單獨罷工的全日本運輸工會十萬人的鬥爭，並得到美軍地方軍政部的合作，對於和二·一總罷工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製鐵公司八幡製鐵所、京都島津製作所等的罷工也都進行了鎮壓。此外還假借妨礙業務、違反食糧管理法、違反選舉法等名義，不斷地逮捕了工農團體的幹部（見經濟學全集，安齋·海野：“戰後日本的勞工運動（中冊）”）。

於是在與憑藉政府對工農保護生活的鬥爭進行壓迫的同時，吉田內閣和國會內的保守勢力相結合，接連地頒布了非民主的法律。即既使勞動基準法未規定最低工資制而完成立法手續，又使它的實施日期延遲至九月間。關於實施“土地改革”的農地委員會的組織，則規定為讓地主、官吏可以掌握農地委員會的權力。而對當時的選舉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事情，就是在即將解散國會時，強迫國會通過（三月三十日）了如前所述的、有利於保守勢力的中選舉區單記名投票制<sup>⊖</sup>的選舉法修改案。

第三，一切反動勢力，由於受官廳的這種態度所鼓勵，或由於直接和官廳攜手合作，就開始公開活動起來。其間，報紙和廣播的向右轉，恐怖團體的猖狂行為也非常厲害。在佔領軍的嚴格檢查制度下，美軍總司令部對資產階級報紙和廣播作極周詳縝密的內容指導，使其具有濃厚的半官方色彩，表現出反共、反工人的性質，開始進行全國性的、有組織的反共宣傳。可是恐怖團體的猖狂竟達到了使外國報紙也加以報道的程度，於是官方對恐怖團體就不得不部分地進行檢舉。報紙和廣播對恐怖團體雖也曾進行過攻擊，但對恐怖團體是在什麼條件下和具有什麼背景而產生的，却一向不加追究，甚至對於恐怖團體襲擊共產黨

⊖ 中選舉區是將一縣分為數區，每區可以選出數名國會議員。單記名投票制是限制選舉人的投票權，即每區不管有多少議員名額，選舉人在投票時只能在選票上寫一名被選舉人。這是日本統治階級為阻礙進步人士當選所採取的無恥手段。

或工會的事情，故意加以默認。正因為對於向山形仁丹工會、全國柴油工會等施行強暴的恐怖團體，對於向栃木縣共產黨議員候選人松本、向銚子的民主戰線議員候選人越川所施的暴行置之不理；所以東京新宿的恐怖團團長尾津喜之助才會成為自由黨的議員候選人；自由黨外圍團體的新銳大眾黨，才能藉着襲擊“產別”議長听濤的餘威，採取了預先約定使用人民廣場來妨礙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行動。

第四，一面配合着這類趨向和步調，一面藉着從內部來分裂工人階級而與日本民主化以致命影響的，就是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日本農民協會等幹部佔其大部分的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它們在二·一總罷工後，立即通過社會黨、日本工會總同盟，發表了將二·一總罷工責任歸之於共產黨的聲明，表明了反共、反“產別”的方針。這也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方針。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勞動教育班長德微拉爾以“捲起紅旗重新出發”（“讀賣新聞”）為題發表意見說：“長年累月一直生活在法西斯主義下的日本人，有被代之以另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並公開建議從工人運動中排除共產主義者。這時，日本工會總同盟曾聲明說：“總同盟從最初起所實行的就是如同總司令部所說的一樣”。並由這類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許多所謂“第二工會”<sup>①</sup>。在農民戰綫中，代表富農的、日本農民協會最右翼的平野派，在二月的大會上，一看出不能掌握到領導權，就在講台上大鬧一通後退出會場，另組日農刷新同盟（即以後的全國農民協會），破壞了農民戰綫的統一。

當時勞動大眾的政治意識，還很難說已經達到充分的程度，能對這類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分裂行動，立即予以徹底的批判。

① 所謂“第二工會”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組織的反動工會。——譯者

由於這類鎮壓和分裂活動，在一部分工人階級中產生了失敗主義的情緒。於是發生了不健全的支部退出全國性同業工會的現象，出現了不少工人放棄工作崗位去作黑市買賣的現象。工人的生活陷於悲慘狀態。由於二·一總罷工受挫折的結果，它使黑市米價在一月底到三月底之間立即上漲了近兩倍（東京都的推定），而包括代用食品在內的主食配給之遲發和欠發，從二月起已遍及於全國。

爲了使都市市民的不滿不要針對着統治者，於是日本政府、報紙、廣播等拚命進行農民因賣黑市而大賺其錢的宣傳，以便引起工農間的分裂。但是在嚴格的徵購制度下，所謂可以賣黑市米賺錢的農家，即除自用食米、徵購米以外可以大量賣黑市米的，也只限於地主和富農。而佔絕對多數的農民是沒有餘米可以在黑市上出賣的；即使賣一點兒黑市，也還不够購買黑市價格遠較農產物黑市價格爲高的肥料和農具。農民並沒有大賺其錢，相反地，政府却使用強權，以不够生產費的徵購價格，甚至把他們的自用食米都奪去了。

站在這種所謂強權徵購前列的就是美國軍隊。二月十九日，駐岡山的美軍軍政部長認爲縣長的作法太迂緩，要求縣長用一切手段完成徵購，並通知說，軍政部將於三月十三日直接對徵購不良的村鎮進行挨戶訪問。同樣的命令，從長崎、新潟、千葉、福島、宮城、山梨、山形、茨城、大阪、三重、秋田等地起，差不多波及於全國各府縣。在三月十二日的日本全國美軍軍政官會議上，還正式決定了对全國徵糧採取嚴厲執行的方針。日本政府受到這種鼓勵，也根據食糧緊急措施令和食糧管理法發動強權，對於不供應徵購米者以拒絕供應罪加以逮捕，甚至沒收其食米；並要求自動供應徵購米，如對徵購額舞弊者，則以煽動罪投入監獄。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本人發出督促徵購的命令。所謂“吉普徵購”就是指此。於是堪與日本戰時徵

發相比擬的、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的食糧強制採購，就全面開始了。這一年（一九四七年）對不順從徵購的農民行使強制措施的事件，甚至根據農林省的調查，也超過一萬一千件（即達每村一件的數字，而實際數字當遠較這個數字為高）。如以青森縣為例，僅在三月份一個月中，就有一千多農民曾被起訴。因此，在全國發出“種稻不敷本”的呼聲，特別是在東北、北陸這種純粹種稻的地區，竟發生不得不靠借米、借地或出賣土地、牛馬、子女以免受逮捕而維持生活的悲慘現象。不要說是靠黑市賺錢了，大部分農民生活的被破壞，這從農村經濟枯竭在三月起急遽惡化以及大多數縣、鎮、村農業會的陷於破產來看也就可以為証了（見伊藤律：“農民運動”、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農業部編：“日本農業年報”第一集）。

在這樣環境中，以美軍總司令部為前鋒，大規模地進行了獵取選舉票的運動。因此保守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乃是當然之事了。

但是，在眾議院的選舉中，社會黨得到了一百四十三個議席，自由黨得到了一百三十一個議席，民主黨得到了一百二十四個議席，國民協同黨得到了三十一個議席，共產黨得到了四個議席。從各黨在選舉中所處的條件來看，共產黨並沒有出乎預料的不振，而社會黨的一躍成為第一黨却完全出乎一切人的預想之外。這不過是說明了，戰敗後為黑市和通貨膨脹所苦的勞動者，在選舉中拋棄了保守政黨，而對社會黨所揭櫫作為公約的社會主義政策有所期望而已。實際上，社會黨在選舉中所作的諾言，是具有符合於國民期望的內容的。例如（一）重要產業的國有與國營，（二）停付戰時公債的利息，（三）日本銀行概歸國營，（四）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五）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縮短勞動時間，（六）斷然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七）減低勞動人民的所得稅和廢止大眾課稅，（八）實施社會保險等。

在日本，这是提倡社会主义的政党首次成为第一党。这也是以社会党为中心的民主势力联合政府，在外表上似有第一次具体实现的可能。

作为对选举结果的批评，麦克阿瑟立即讚美说：“日本国民断然排除共产主义的领导，绝对地选择了中庸之道。也就是为了保持个人的自由、提高个人的权威，选择了极右和极左之间的中间道路”（四月二十七日）。无疑地，麦克阿瑟是不会支持社会主义的，那末，为什么麦克阿瑟能够把希望放在社会党身上呢？

## 二 社会党首相内阁的成立

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的社会党大会上，社会党总书记西尾末广就曾说过：“为了联合四党和保守阵营进行斗争，应该和它们组织联合政府”。西尾所说的话，虽然就道理方面来说，除了他自己以外，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但就他的用意来说，一般人谁也懂得他不过是说要和保守政党合作而已。并且在一九四七年一月，面对着劳动攻势的吉田内阁，曾通过和田农林大臣、有泽教授、木村国务大臣，对社会党左派的铃木茂三郎、右派的西尾末广、极右派的平野力三，进行过入阁谈判。结局虽未获成功，但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政策的分歧。这从社会党的佐竹晴记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在国会上追究“联合工作因石桥问题而未能实施”时，大藏大臣石桥所暴露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石桥说：“关于这一点，森户（森户辰男是社会党当时的政务调查会长、属社会党右派）不是曾经说过，作为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社会党也有它的立场，所以只要政府假装一下要实行的样子就行了吗？我觉得对这种事情不过份加以追究，对社会党是有好处的”。

在迎接四月大选时，自称“劳动阶级代表”的社会党干部他们的选举资金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正如後來在非法財產交易委員會中所暴露出來的一部分情形一樣，右派代表的西尾末廣，“以社會黨總書記地位的西尾個人”，或僅僅以“西尾個人”名義，曾接受大阪大土木建築資本家大林組五十萬日元和接受吳名昭著的昭和電工公司一百萬日元的鉅額獻金。雖然這在法律上不能以“賄賂”論罪，但是却不能抹煞從壟斷資本接受了“禮款”和“政治獻金”的這一事實。而且壟斷資本的代表曾明白表現其意志說：“在這次選舉時，因為正在赤旗的暴風雨中，所以希望走中間道路的政黨獲得發展”（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大林組經理在非法財產交易委員會的証言）。西尾本人曾明白作証說：這筆款子是散發給了他的部下熊本虎藏、大矢省三、原虎一、渡邊年之助、永江一夫等四十人。在這方面左派也毫不讓人，僅就已知道的說，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加藤靜枝從東亞興業公司的梅村清那裏接受了一百萬日元；此外，加藤勘十從工人們正與其進行鬥爭的保土谷化學經理那裏接受了選舉資金（見井上清：“日本政治腐敗史”）。

因此，在一九四七年四月當選的社會黨議員一百四十三名中，就出現了以公司經理和董事佔三十七名、資本家團體職員佔二十八名、律師和公司職員佔三十四名的這種按幹部職業區別的分佈情況（見大曲直：“日本社會黨論”）。

但是，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特徵是從內部破壞工人的統一和不履行它的口頭諾言。在這一點上，大部分日本社會黨幹部也和世界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一丘之貉。

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在選舉的第二天曾斷然說：“要始終和保守反動陣營相抗爭，並通過議會實行革命”（見“朝日新聞”，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但在口沫未乾的數日以後，片山等所着手的工作，不是和民主勢力相聯合，而是和保守政黨組織“舉國”聯合政權。這不過是完全仿效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即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口中一直反對戰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幹部

一樣，与战争爆發同時，它就推翻了一星期前的宣言而協助从事战争。

由於社会党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起正式開始和自由党、民主党、國民協同党進行联合工作的結果，根據社会党提出的協定案，在五月十二日成立了四党的政策協定。但其中絲毫沒有包含社会党任何一項的選舉公開諾言在內。雖然社会党辯解說，因為这是和其他政党的協定所以不得不如此云云，但首先在社会党所提出的原案本身中，就絲毫未曾包含任何一項選舉時的公開諾言在內。不僅如此，在這個四党協定中，明白規定着“不凍結新日元，不停止支付國債的利息”；这就証實了前大藏大臣石橋所暴露的前述社会党和自由党的秘密政策協定是實有其事。此外，社会党还承認了下列三條件：（一）反对極右和極左（即反对共產党的意思），（二）不洩露重要机密（即不將重要問題訴之於大眾的意思），（三）不從事有引起社会不安之虞的行動（即不要求議會以外的運動的支持的意思）。即使如此，还担心不能完全解除壟斷資本的不安。於是号称左派的鈴木茂三郎和加藤勤十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發表了“和共產党劃清界綫”的談話；接着又說明了他們的真心是：“过去之所以表面上和共產党有若干合作，这是因為在使工会疏遠共產党上有其必要的緣故”。因此，毀棄公開諾言以及和保守政党联合，並非單純地為了希望取得政权；而是因為在抑制共產党和幫助壟斷資本上有其必要的緣故。

最後，自由党拒絕入閣。它所宣佈的理由是因為自由党會要求社会党開除左派分子而未被接受的緣故。但是在五個月以前，自由党内閣對於還沒有發表反共声明的左派，不是也曾作过促使其入閣的努力嗎？自由党幹事長大野等在屢次声明中曾經表示，該党既不希冀首相的位置並已滿足於政策協定；那末，当自由党所極力期望的反共的全國一致內閣計劃即將實現的時

候，自由黨的引身而退，就必然是有其他的理由了。

禁止二·一總罷工及以後的反動行爲會引起人民的極端憤怒，這從社會黨在選舉中成爲第一黨一事就顯然可以看出來了。當自由黨正進行入閣活動時，在全國曾引起強烈的反對呼聲。特別是在選舉中成爲擊潰自由黨原動力的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入閣，表示了將以罷工進行鬥爭的態度。如果讓極右的反動政黨參加內閣，統治階級首先就沒有能夠抑壓住人民的自信。並且，在危機中的日本，如果成立了一個除共產黨外包括全部政黨的全國一致內閣，而又未能克服這個危機時，那將成爲什麼局面呢？那才真正是充分具有使共產黨勝利、使壟斷資本徹底毀滅的危險。因此自由黨的拒絕入閣，必然是由於這個道理。這種頭腦清晰的想法——事實上，當時這種預想已快要實現了——由頭腦糊塗出名的自由黨想出來是困難的。這不禁使我們回憶起，正如馬克·蓋因、約翰·根室等衆口一辭所說的那樣，深受美軍總司令部最高幹部集團所賞識的自由黨的吉田茂在這次入閣談判中曾不斷和美軍總司令部採取聯絡的事實。

於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社會黨的片山哲遂被選爲首相。第二天，麥克阿瑟發表了“這充分表示日本的國內政治在向中間道路前進”的聲明，並爲它祝福。

### 三 勒緊腰帶生活的實現

由社會黨五名、民主黨五名、國民協同黨一名擔任大臣所組成的並以片山爲首相的中間道路內閣，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誕生了；它於六月十一日發表了八項“經濟緊急對策”後，七月五日又同時公佈了這個經濟對策的基礎——“新物價體系”及其基本資料——“經濟白皮書”。

新物價體系的工資爲戰前（以一九三四—三六年爲基準）的二十七至二十八倍（規定以一千八百日元爲工資基數），米價爲

戰前的四十五倍，一般物價為戰前的六十五倍。但對生產價格已定得很高的主要商品還額外給予價格差額津貼。例如煤炭價格為戰前的一百二十倍，硫酸銨為戰前的一百三十九倍，銑鐵為戰前的二百一十倍，鋼材為戰前的二百二十倍；打算從給壟斷企業的商品以遠較戰前為高的消費者價格着手，藉以圖謀所謂經濟的復興。一看這些倍數就會明白，這是利用低工資、低米價、高物價來犧牲人民，以便重新復活陷於危機中的壟斷資本。第一，這裏所決定的工資水準，即所謂一千八百日元基準，是首先以鋼鐵業能盡量賺錢來決定煤炭價格，又以煤炭業能盡量賺錢來決定煤炭工人的工資，然後以此項數字作為全體工人的工資水準。所以從最初起，這就是為了確保高額利潤所製定的低廉工資體系。而為了維持這種低廉工資，就必須保持低米價。至於所謂平衡價格計算法<sup>⊖</sup>，表面上雖然很像對戰前的生產價格已有所補償似的，但實際上是利用把農民勞動、黑市肥料等所有生產價格都不包括在內的計算法，將米價規定在遠較生產價格為低的水平上。此外，對壟斷企業，藉所謂“重點主義生產”的名義，不僅給它們以價格差額津貼，還利用復興金庫的貸款、優先分配物資等方式，把人民的稅款和物資都集中地給它們了。而據經濟白皮書說，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夠提高生產和擴大貿易（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這種辦法連片山內閣也不能稱它為“社會主義”，於是創造了所謂“高度民主主義”的名詞。但是，這種“高度民主主義”，毫無疑問，正因為它在維持和扶植壟斷資本上是高度的，所以壟斷資本的代表人、經濟團體聯合會的石川一郎才稱讚它“實在是很

⊖ 平衡價格計算法是選定某一時期作為某項農產品的價格標準，並計算出該項農產品價格與一般物價的比例；如一般物價上漲，即按照此項比例提高該項農產品的價格。這是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手法；日本政府即用此法計算米價。——譯者

好的对策”(見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自由黨也才“对政府的態度表示敬意”(見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朝日新聞”)。

片山本人在組閣後第一次談話中就大嚷要犧牲人民的生活。在以“向國民呼籲”爲題的廣播中,這個社會黨員的首相說:“爲了克服通貨膨脹、復興生產,甚至還要要求繼續過比目前爲甚的勒緊腰帶生活”(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於是“勒緊腰帶生活”這句話成了流行語。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博雄曾極力廣播說:計劃在十一月間要使勞動者的家庭經濟有盈餘(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但是,這所謂盈餘是在預定的超過勒緊腰帶生活上的盈餘,即四點二人一戶的人家,每年有木炭三簍,五年有毛巾一條,五天每人有手紙一張,五月可以理髮一次。

而且在資本主義中,計劃經濟至少從所謂改善人民生活之類的、資本主義的“由上決定的計劃”,是從來未曾有過一次成功的事情。就在發表了“盈餘說”的那個月中,甚至根據總理府統計局的調查,生活費業已較政府的預定上漲了兩倍(日本全國二十八個都市中,五口之家的平均生活費爲五千四百五十七日元,其中飲食費爲三千七百三十日元,佔消費款額的百分之六十八)。其所以如此,固不僅僅是由於資本主義決不能夠對物價作本質地統制的這一鐵則;還由於片山內閣雖然口稱“健全預算”並確曾在一般會計中減少了赤字,但是在特別會計中卻又編入了龐大的赤字;再加上前任內閣時代的復興金庫貸款及其他對壟斷資本救濟費的發放,因此從一開始就親自製造了引起通貨膨脹、破壞物價體系的因素。於是,黑市價格平均每月以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比率上漲,片山內閣也就隨之不斷地提高了公定價格。但是資本主義的工資統制,只要是沒有工人的反抗,就會日趨嚴重的。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已完全釘死在一千八百日元的基準之上。雖然拿這點工資已不可能過活,而主

要食糧的延遲配給竟在全國日趨嚴重（延遲配給的情形至七月二十日止，全國平均延遲了二十日，北海道延遲了九十日）。這種延遲的配給，竟以飼鳥的玉蜀黍、吃了以後誰也會壞肚子的大豆粉等作為主食的。

工人階級首先對這種生活的破壞進行了反擊。在二·一總罷工後採取守勢現在又活躍起來了的工人階級，從一九四七年七月底起，以機械、化學、印刷出版業為首，在私營企業中發動了要求打破飢餓工資，要求彌補虧空的津貼的鬥爭，並獲得了統制數額以上的工資。於是重新復活壟斷資本為目的的低工資體系，立即依靠工人的實力，開始被打破了。

一見這種情形，立即趕來救援片山內閣的便是美軍總司令部。本來所謂片山內閣的緊急經濟對策，不過是把作為“促進經濟統制”的、麥克阿瑟三月二十二日致前任首相吉田信件中的內容，再加上所謂“保證勞動者生活”這一項適合於中間道路內閣的話而已。所以，美軍總司令部一看見從“保證勞動者生活”這一項開始的整個經濟體系行將崩潰時，就首先拋出了大量的糧食（當然，正如前述麥克阿瑟報告中所說的一樣：“這並不是為了慈善”）。美軍總司令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拋出了二十二萬噸糧食，特別是八月九日在九大都市中拋出了一萬一千噸糧食，八月二十日又預先付給日本政府以九、十月份的六十六萬噸糧食。接着，八月十四日，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設立一億二千七百萬美元的輸出入周轉基金的決定，並公佈自第二天（八月十五日）起准許重新開放壟斷資本所期望的私人對外貿易。這種貿易，完全處於美軍總司令部的管理之下，因為它的目的是在於藉低廉工資為基礎實行飢餓輸出，藉加重人民負擔來輸入高價的商品，所以其意義是讓外國來剝削日本人民的血汗。但是從以壟斷資本為本位的復興經濟政策轉為依靠吸收外資和重新開放對外貿易的片山內閣說來，却把它當做“久旱的甘霖”（一九四七年八月十

五日片山談話)來加以歡迎了。

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工政策是以二·一總罷工為分水嶺而大有改變。這種改變從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詹姆斯·基倫四月二十四日就任日本勞工顧問時起就很顯明了。在基倫帶至日本並由他發表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的公開信中，希望日本工人不要依靠鬥爭，而要“依據集體合同及勞資的書面協定”來改善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用經濟科學局勞動部的名義，發表了所謂工會民主化，即排斥和攻擊共產黨的小組活動的小冊子（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四月二十九日，基倫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勞動者為了改善生活，所需要的只是增加生產和堅固的集體合同”（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讀賣新聞”）。代表這種說法的三項政策是——（一）以工會“民主化”的名義，用排斥共產黨小組的方式，奪去共產黨對勞工運動的指導力量；（二）把勞工運動限定於集體談判、集體合同的範圍內，奪去工人的戰鬥性；（三）以增加生產的名義企圖協調勞資關係；這就是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的基本論調。這種基本論調，以後由基倫和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人員屢屢作為談話加以發表；並且利用電影、小冊子、教育講座等手段來大肆宣傳。此外，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美軍總司令部發出許多的“勸告”或“忠告”，對日本的工人運動進行了強烈的干涉。

在九月初開始設立的勞動省，就是沿着這條路綫進行活動的。最近，加藤勘十以“設立勞動省的內幕”為題發表文章說：“勞動省完全是服務機關而不是權力機關。首任勞動大臣米窪曾極力說明這一點，而繼米窪後任的我，也強調這一點。在全官廳工會協議會的爭議中，我就是這樣來實行的”（“改造”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加藤是怎樣“實行”的，姑留待以後再說；而米窪所極力說明的則是“保證生活就會製造惰民”（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所說）和“為了復興生產應迅速解決

爭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所發表的勞動對策)。所以勞動省不是為日本工人服務的機關，而是為美軍總司令部和日本壟斷資本服務的有力機關，這已由他們自己屢次予以証明了。

當然，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曾經拚命為“勒緊腰帶生活”作宣傳和辯護。日本工會總同盟，在與片山內閣成立同時，就發表聲明全面地支持這些宣傳。號稱為勞動統一戰綫的、在二·一總罷工後從“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發展而成的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勞聯”），它雖然鬆懈，却是日本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唯一的全統一組織（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成立）。日本工會總同盟對於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不是使它加強而是要它“和社會黨合作”，並利用“盡量避免罷工而應重視談判鬥爭”的原則去抽掉它的骨骼。除此以外，還提議另外組織一個新的全國協議會（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甚至被稱為日本工會總同盟左派幹部的高野實，在出席大阪“產別”的演說會中也說：“對於罷工的地方不借錢，解僱工人也是不得已的”（龜田東伍：“工人的政治生活”）。在農民戰綫方面，同屬左派的野溝、稻村、岡田等日本農民協會議員團，與鈴木、加藤的反共聲明相呼應，提倡排斥共產黨，而與主張政治自由的黑田壽男等社會黨統一左派（純正左派）相對立。他們從七月起組成日本農民協會主體派，開始進行分裂日本農民協會的活動。所謂社會黨左派雖未參加內閣，但在國會中加藤擔任勞動委員長，鈴木擔任預算委員長（在社會黨內擔任政務調查會長）；他們與右派分工合作，在國會中起了協助片山內閣的作用。而他們看到人民的不滿日益高漲時，八月底，以鈴木為中心擬訂了補充政府經濟政策的緊急對策草案，並為宣傳此項草案曾在全國掀起遊說運動。這草案雖認為“政府的對策不夠完全”，但它也不過是在政府方案上稍稍增加一些左傾的詞句而已，基本上它和政府的對策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在作為草案中心的工資物價對策中，就認為“維持一千八

百日元基準而重新開放對外貿易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並應宣傳解釋，在明年下半年以前，勒緊腰帶生活是使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的一半和穩定國民生活的基礎”。又說：不能“贊同如共產黨所煽動的、每人每月三千六百日元之類的不合法的提高工資要求”，而認為“工人階級有堅持勒緊腰帶生活，燃燒起建設精神”的必要；並應“努力使工會運動的主要方向轉移為重建經濟和復興工業的運動”。所以大部分社會黨右派和左派的幹部，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自由黨和壟斷資本都積極支持片山內閣的經濟緊急對策，特別是對於凍結工資政策，不惜全面加以協助。尤其它們極力鼓勵和督促能壓制工人的片山內閣利用行政整理和整頓企業去實現產業合理化，而這種企圖是過去被十月鬥爭和二·一總罷工所打垮了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前首相吉田在國會中作代表質問時說：“第一，如果不重新開放對外貿易，就不可能防止通貨膨脹和安定國民生活。……第二，首相應使人民大眾透徹了解目前的經濟實際情況，關於產業合理化和裁減冗員，希望採取斷然的措施”。片山內閣為適應這種要求，於是在七月中改訂了“貸款規則”，並逐漸限制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是，壟斷資本對此仍感不足。日本銀行總裁一萬田曾發表談話說：“對虧空者給與貸款是不會實行的。對於不解僱工人的企業也不給予貸款。並希望政府斷然實行行政整理和產業合理化”（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是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和田答覆說：“如果不實行國有企業的合理化，私營企業就很難實行調整”，表示將着手行政整理（十月二十九日）。首相片山對此表示同意，並在國會中答辯說：“政府認為緊縮行政人員不必等待草定具體方案，今後將局部地順次實行”（十二月五日）。

於是，片山內閣，在整個統治勢力的支援下，實現了“勒緊腰帶生活”。

黑市價格每日上漲，即使根據東京都的調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比頭一年上漲了約三倍，平均約達公定價格的十倍。不僅是黑市價格，即使被統制的物品的公定價格，八月是魚類，九月是交通費，十月是香煙等，低的上漲了百分之六十，高的上漲了兩倍至三倍。

主要食糧的延遲配給，在十月間，平均起來，東京為二十日，北海道為六十日；最後到十月底時，竟採取了把全國二百零五萬七千石延遲配給的糧食一筆勾消的殘酷措施。這項够二百五十萬人吃一年的配給糧，竟用一紙行政命令完全勾消了。

而且，只有工資的公定價格、低米價與重稅絕沒有改變，所以家庭經濟當然不會有盈餘。即使根據勞動省的工人每戶家庭經濟調查，在應該出現盈餘的十一月時，勞動收入僅及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五，就是把借款和賣衣服的錢計算到收入之內，每月支出的百分之五·七仍然是赤字。

這樣當然無法生活下去。而事實上有一位遵照政府命令拿一千八百日元基準薪水專靠配給生活的法官就餓死了。這事件曾在報紙上哄動一時。這因為他有法官的地位，報紙才會採錄為新聞，至於報紙所不採錄的“無聲的人民”，或者在上野的山上，或者在大雜院的破屋中，則在不斷的死去。

#### 四 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的產生、 片山內閣的瓦解

在資本主義下面，人民如果不進行鬥爭，那就惟有受苦到死。

親身體驗了這種痛苦的工人，先要求發給突破危機費和生活虧空補助費，到九月左右進而提出了提高工資基準的長期要求。雖然未能達到所要求的數額，但是由於打破了統制工資，便獲得了個別擊破按行業來劃分的工資制度的結果。

工資被固定為一千八百日元基準的國營企業工人，也从七月起，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為首，開始要求發給臨時費；九月，以全官廳工會協議會（簡稱“全官”）的名義，向政府提出了打破一千八百日元基準和保證可以產生二千四百卡路里的最低工資制的要求。當政府正式拒絕此項要求時，被禁止從事罷工的官公廳勞動者，在分別向中央勞動委員會、地方勞動委員會提出控訴同時，並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全國財務工會為中心，展開了激烈的地區鬥爭和工作崗位鬥爭。他們開始突破了所任幹部操縱鬥爭的範圍。

這種自下興起的工人秋季攻勢，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的反共和分裂工作在羣眾中失去了依據。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日本工會總同盟大會上通過了支持社會黨、堅持一千八百日元基準的決議案，這件事情使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幹部陷於孤立。十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受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的唆使，發出要把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集體請假戰術作為“野貓罷工”<sup>①</sup>加以處分的警告時，結果在工人團體中只有日本工會總同盟支持政府的這種警告。

但是分裂主義者是不會就此默然退却的。他們是愈受反對就愈想用陰謀進行巧妙的分裂。特別是在美軍總司令部壓力甚強的新聞通信廣播工會中，就以讀賣新聞工會（在美軍總司令部直接干涉下，在罷工中新組成的御用工會）和廣播第二工會（完全接受資本家的要求，把從工會中驅逐出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訂入規章中的御用工會）等為中心，大規模地進行了分裂和退出工會的活動。

在這類分裂活動中，首次給與日本工人運動以最大打擊的

<sup>①</sup> 所謂野貓罷工（Wild Cat Strike）是指個別工會組織不根據工會總部的命令，而自行進行集體請假之類的鬥爭。——譯者

就是破壞了煤礦工人的統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是强有力的煤礦工人攻勢的後援者，這個協議会是由“產別”的全國煤炭產業工会（簡稱“全炭”）、中立的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簡稱“炭联”）、日本工会總同盟的日本礦山工会（簡稱“日礦”）這三個工会合組而成的。它是日本工人統一戰綫最有力的堡壘之一。但是從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就遭遇了資本家团体（日本煤炭礦業聯盟）露骨地策動分裂的陰謀，並由許多社会民主主義者開始從事分裂它的活動。這在十月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大会上終於爆發出來了。

掌握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領導权的武藤武雄，在这次大会上是分裂主義者的中心。當他在批准職員問題上和組織問題上屬於少數派的立場時，他就主張推翻原議從新討論，並且主張取消多數表決制而採取協議制。當這類主張又被否決時，他就率領着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及許多日本礦山工会的代表退出會場，另外組成了所謂“不容獨裁陰謀分子有參加餘地”的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簡稱“炭勞”）（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於是，剩下來的全國煤炭產業工会（簡稱“全炭”）和中立工会就組成了全國煤炭工会（簡稱“全石炭”）這一同業工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毫無疑問，在瓦解這個煤礦工会全國協議会中，分裂主義者的策動及其推動者的資本家团体的陰謀，以及日本煤礦工会联合会、日本礦山工会等主要是由中小煤礦工会組成的這種情況是起了作用的。但是，除此以外，作為使這些分裂工作容易進行的社会條件，則是殘留在煤礦中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煤礦勞動，雖然是最現代化的勞動，但在日本，工人幾乎全部是出身於農村；於是，一方面盡量省去機械的使用而使他們從事手工勞動；同時又被著名的禁閉室和工头制度等封建的勞動組織所圍

繞着。這種從工作場所和社會全體有聯繫的濃厚的封建結構，正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有機可乘的絕好條件。例如屬於武藤武雄的地盤的常盤、北海道、北九州煤礦，在煤礦勞動中，也是封建色彩最濃厚的地方。

日本煤礦工人所從事的既是現代化的勞動，但是勞動組織同時又是封建性的；這裏面就存在着日本煤礦工人之所以既能進行勇敢的鬥爭，同時又經常為分裂活動所利用的基礎。

在農村中被封建土地所有制強烈支配着的日本，封建制度不僅從根本上束縛着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並且給社會民主主義者提供了與特權階級相勾結而從事活躍的絕好條件。因此，封建制度對於團結一致進行鬥爭這類現代工人的唯一武器，也就起了腐蝕的作用。

國營鐵道工人和煤礦工人一樣，一面從事着最現代化的勞動，一面由於大部分是出身於農村或與農村有深刻聯繫，加之，還受着封建身份制度的強烈束縛；所以他們的情形也就和煤礦工人大体相似，即最具戰鬥性的鬥爭和被分裂活動所利用的情形，由於時間、地區和工作崗位的不同，彼此交錯地消長着。

利用美軍總司令部建議的“工會民主化”名義從事分裂活動，是從國營鐵道工會開始的。

從十月十六日起，在東京舉行的國營鐵道工會臨時大會中，當反映工會會員的意志把右派所提出的職位等級制工資方案和壓迫地區鬥爭的鬥爭方針分別以三十票和七十票之差加以否決時，右派就採用妨礙會議進行和退出會場的戰術使大會陷於混亂，而擔任大會主席的右派分子齋藤鉄郎就趁此機會，片面宣佈大會散會。於是，齋藤等人二十日在大宮聚會，協議在國營鐵道工會內製造反共組織。此外，他們又得到了日本勞工運動最大叛徒和強有力的戰爭協力者的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等的指導；十一月七日，以星加要、長谷川英雄、齋藤鉄郎等為中心的國營

鐵道工会最右翼幹部聚集在上野車站，組織了國營鐵道工会反共聯盟（一九四八年三月，改稱為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而成爲所謂“民主化同盟”的前驅。

民主化同盟的特徵，就是要奪去工人的戰鬥力量。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所製定的基本方針，絲毫沒有規定如何進行鬥爭，而只是強調“排斥共產黨，防止共產黨員充當工会職員”。並且，在它的宣言中說：“這一英明的決斷（使大會流產）很好地防止了國家的危機，完全地粉碎了共產黨的陰謀。但是，和他們的戰鬥並未結束，而只是剛才開始”。於是，反共聯盟發表了所謂二·一總罷工時共產黨的秘密指令，把它當做“共產黨陰謀”的證據。但是，所謂秘密指令既沒有發令者的署名，而內容又是說“革命委員應於二月一日午前零時採取特殊行動”，對根本不存在的“革命委員”令其採取莫名其妙的“特殊行動”。這不待共產黨正式否認，就可以看出是漏洞百出的偽造指令（勞動省一九四八年版“資料勞工運動史”）。

儘管成立了社會黨內閣，又有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裂活動，但是由於工人攻勢的高漲，終於使日本政界發生了動搖。自由黨拋棄了壓制不住工人的片山內閣，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發表在野黨宣言，開始進行以建立反共、反社會黨的保守政黨聯合內閣爲目標的活動。因此，這也就引起了社會黨右派內部矛盾的增漲。主張開除社會黨左派以便和自由黨、民主黨聯合的農林大臣平野，因爲和主張一面利用左派以壓抑勞工運動一面繼續維持與民主黨、國民協同黨聯合的國務大臣西尾發生衝突，在十月間被罷免職務。於是，平野以全國農民協會的國會議員爲中心，在社會黨內組成了與自由黨相接近的最右派。與此相反，以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爲中心的社會黨最左派（純正左派），反映了人民對政府的尖銳攻擊，開始批判和保守政黨的聯合，而強烈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加藤、鈴木等所謂左派，也

被捲入其中，在農林大臣等問題上開始和右派趨於對立。關於內閣政策問題，民主黨過去是听任社會黨右派及與右派合作的、以和田博雄（現在的社會黨左派）為中心的經濟安定本部的官僚去掌管。現在民主黨看見社會黨的這種分裂情況，於是在十月二十一日，藉着將預算編製權從經濟安定本部奪到大藏大臣栗栖（栗栖屬於民主黨。——譯者）的手中，遂掌握了內閣的主導權，並且強調應利用整理企業、吸收外資來打開經濟危機。

但是，生活被迫得走頭無路的工人，卻從秋季攻勢接着轉入了冬季攻勢。

全通信從業員工會將計就計，利用“野貓罷工”的警告，交替使用慰勞休假、舉行工作場所大會、要求特別配給等的複雜戰術，擴大了地區鬥爭、工作崗位上的鬥爭；並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起，在全國同時舉行了三天的反政府的波浪式的鬥爭。國營鐵道工會的下層工會，也排除了反共幹部的壓迫，開始進行地區鬥爭和工作崗位上的鬥爭。被公務員法剝奪了罷工權的各官廳職員工會，也運用定時下班、一齊請假等戰術逼迫政府。這終於使政府屈服了。十二月十五日，政府接受了中央勞動委員會所提出的支付二月至八月份生活補助費的妥協方案。但是全官公廳各工會當知道這是將稅款包括在內時，除領導權被右派掌握的國營鐵道工會以外，都對決定新工資的薪給審議會加以抵制，並將鬥爭集中於要求最低工資制的運動。

私營企業工人的鬥爭，當接近年底時也日益尖銳起來，特別是依靠下層的共同鬥爭使工人的統一戰綫從下層鞏固起來了。他們排除了分裂主義者的策動，在十月底，全國金屬產業工會（簡稱“全金屬”），十一月、日本自治團體工會總聯合會（簡稱“自治勞聯”）及全日本化學工會（簡稱“全日化”）之類的全國性企業組織，或者是新組織起來，或者是大大擴大了。反映這種趨勢，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產別”大會中，批判了片山

內閣的全部政策，決定由工人親手發動獨立的復興生產鬥爭。

此外，片山內閣的“經濟復興”對策，還破壞了中小企業家和農民的生活。在選舉時公開約許要挽救中小企業的社会黨內閣，把產業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幾乎完全集中地給與壟斷資本了。據該公庫一九四七年度第一季度的報告，中小企業僅佔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五點四；若就對虧空者的貸款而言，實際上所佔不及百分之一。再就全部應進行配給的資材方面說，其大半也是集中於壟斷資本。一九四七年七月，東京中小工廠所分得的配給資材僅及批准配給的全部必需資材的百分之三十六而已（據東京市政調查會調查）。因此，壟斷資本的懷裏雖然是充滿了資金和資材，但中小企業却為獲得資金和資材所苦。

在片山內閣下，對農民除強迫徵購麥子外，並和戰時一樣還強迫攤派稻米的數量。社会黨本應實行它所許諾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但它在組成內閣後，却在議會中表明：“不考慮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農林次官井上）。不僅未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它對地主的收回土地也不加制止，於是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這四個半月內，僅據農林省的調查，地主收回土地的件數已達一萬三千五百七十起（見“日本農業年報”第二集）。

於是，片山內閣利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追加預算，一方面大規模地提高對大眾的徵稅，一方面以臨時所得稅和非戰災者特別稅等新稅大大加在農民和中小工商業者身上。

“社會主義”假面具最後由於煤炭國家管理案而完全被揭穿了。雖然這是片山內閣時期社会黨所採取的唯一的“社會主義”政策，但實際上從它的原案內容看來，這是違反社会黨的選舉諾言的。而它和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的命令一樣，不過是為了出產三千萬噸煤，又要“避免根本改變過去的私營企業的經營方式”來實行國家統制而已。所以，把煤礦工人統一起

來了的煤礦工会全國協議會，攻擊該案是“輕視目前推進生產的中心力量的煤礦工人和工会的存在，一步也未超出和資本家相妥協的”“官僚本位的法案”。法案製訂者的社會黨商工大臣水谷，是明知如此而將法案向議會提出的。他說：“打開天窗說亮話，這個法案不過是把以前所一直在實行的現實辦法作法律上的確認而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衆議院礦工業委員會發言）。

而且連這個法案也受到了資本家的攻擊。在自由黨總裁吉田的女婿麻生多賀吉的指揮下，以北九州為中心的煤礦資本家，以東京神田的龍明館這家旅館為大本營，公開說要用一切手段來阻止這個法案。正如以後在議會中所暴露的一樣，他們公然散發了估計約一億至二億日元的現款來收買議員和閣員。雖然未能達到否決法案的目的，但是在逐漸抽去法案的主要精神這一點上却大獲成功。即使如此，幣原之流的保守的資本家代表仍認為民主黨所提倡的“修正資本主義”頗有冒犯神聖私有財產制度的危險，他不但反對這個煤炭國家管理案，並為尋求從事剝削的自由而退出了民主黨，另外組成了同志俱樂部。之後，它又與自由黨合併而組成了民主自由黨。

社會黨每當被迫履行公開諾言或遭受國民批評的時候，以西尾為首的幹部就衆口一詞辯解說：“這由於社會黨不是一黨內閣的緣故”。這就表明，對於片山內閣，早已不可能希望它會有證明其為“進步”政黨的任何政策了。相反地，商工大臣水谷早在入閣時所說的：“保守陣營的人不能對勞動階級講的話由社會黨來講，這就是我們的使命”（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日本經濟新聞”），却完全成了事實。於是日本國民對社會黨是所謂“勞動階級代表”的期待，就徹底被叛賣了。

十二月十八日，當全國工会聯絡協議會在人民廣場召開確保最低生活權人民大會時，雖然日本工会總同盟的幹部事先得

知這個大會具有攻襲片山內閣的色彩，並下令所屬工會不得參加，但是屬於它的東京交通工會和關東金屬工會却不顧這個命令，根據工會會員的決議參加了大會。由於中小企業家和貧困的農民表現出日益增長的不滿，由於工人在二·一總罷工後採取和農民、市民合作的政策，並通過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的電力罷工、全國財務工會的反對對大衆課稅運動等，代表了開始部分實現的工農同盟和自主的復興生產鬥爭；所以，除日本農民協會外，連從來未曾出席過這種大會的中小企業家的團體，也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以二十餘萬羣衆的名義，宣誓“由工農和市民等勞動人民之手來開始復興生產和重建祖國的鬥爭”，並全體一致通過了對片山內閣“我們已經不能再有任何期待”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一月社會黨當作廢除四黨協定的理由曾說：“現在社會黨在大衆中的威信已掃地無餘了。我們听听道上行人或電車上的談話，往往有些話實在想掩耳不聞”。看見了國民的憤怒情形，即使在社會黨內部，下層黨員和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等左傾幹部（純正左派）也尖銳地發出了反對和保守政黨聯合的呼聲。在這種壓力下，鈴木、加藤等所謂社會黨中的左派，組織了五月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聲明，把罪過完全歸咎於和保守政黨相妥協的四黨協定問題上（實際上，一如前述，社會黨在它所提出的協定原案中已無選舉諾言的痕跡，並且左派所製訂的緊急對策草案，在本質上也是和四黨協定相同的）。其中並稱，在廢除四黨協定以前，他們在社會黨內將保持在野黨的立場。於是他們和右派就對立起來了。同時，由於整肅平野力三的緣故，與西尾對立的最右翼的平野派（全國農民協會派）退出了社會黨；他們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組織了幾乎和保守黨沒有兩樣的社會革新黨。當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召開社會黨大會時，下層黨員的不滿就爆發了。於是，和右派幹部的意志相反，大會通過了以廢除四黨協定為首的、停止支付戰時公債利

息、要求實施徵收第二次財產稅、要求實行第三次“土地改革”等決議。

但是，民主黨已看透了社會黨幹部的底細。社會黨右派的片山在新年致詞中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戰士”（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日本各報）。社會黨左派的加藤也說：“片山內閣已離開了社會黨的本來面目，代表社會黨本來面目的只有我加藤了。我在二十八日曾應邀和某有力者（大概是美軍總部的幹部。——作者）會面，那個人說，他對於社會黨在一月的大會中重新恢復了本來面目一事從心底裏感覺欣慰，只有依靠這種辦法，才能使日本從共產黨的政策中獲救。我當時也大為興奮，並誓為此而盡全力。各位雖對片山內閣失望，但希望不要因此對社會黨失望”（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加藤在長野的談話）。他們看穿了，只有提倡反共才能夠和保守政黨聯合。民主黨總裁蘆田，為了對抗當時以自由黨為中心積極進行的自（由黨）民（主黨）合併活動，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底，提倡組織中央政治協會。根據民主黨幹事長竹田的說明，這是包括社會黨在內的反共勢力大聯合。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社會黨大會上，仍保持了許多黨內職位的社会黨右派分子會響應此舉。於是首相片山宣佈着手企業整頓和行政整理（一月二十二日），勞動大臣米窪發表了着手修改（改得更壞）勞動法規（一月二十七日）。最後，片山政府藉口對全官公廳人員支付零·八月的生活補助費，向議會提出了再度將鐵道運費和郵費約提高三倍的追加預算（一月三十日）。

日本國民看見這種情形，於是轉取突擊了。

從一九四八年二月起，日本電氣產業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官廳工會協議會、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會相繼決議，舉行反對解僱、反對修改勞動法規的鬥爭。資本家所最懼怕的電氣產業工會的罷工，在不顧幹部的妥協下，由各支部開始了地

區鬥爭。迫於這種情勢，電氣產業工會中央鬥爭委員會也下令從二月五日的事務罷工起舉行全國性的第一次攻勢。同時，由於年底開始的強制徵稅的所謂“稅款旋風”，遭受了嚴重剝奪的中小企業家和農民，也開始了真正的反徵稅鬥爭。並且，因為公佈要提高學費，於是以全國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為中心，大學和高等專科學校學生為反對提高學費，開始了戰後最初的全國性學生運動（二月七日全國大會）。廣大的國民，不僅批判了片山內閣，似乎對於議會政治也開始不信任了。

站在國民各階層鬥爭前面的，就是二·一總罷工後一直在從事着日常鬥爭的共產黨。共產黨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發表了鬥爭宣言。其中說：“片山內閣強迫實行以壟斷資本為中心的亡國政策，公然開始了對人民的進攻。因此，現內閣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正在成為大眾的憤恨之的。……讓這種反人民的內閣繼續多存在一日，不過是使亡國之時提前十日而已。我黨除與人民大眾一齊要求片山內閣立即辭職外，並相信已到了應竭盡全力來打倒它的時候。只有站在工人、農民、中小企業者、市民、正直的產業家——即大多數國民利益的立場，並組成代表這一切民主勢力的民主戰綫，才能克服這種危機，才能保證民主主義和民族獨立”。這是第一次提倡組成民主民族戰綫。

在這種國民攻擊的壓力下，二月五日，社會黨左派以國會預算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為首，同意了撤回政府提出的追加預算的決議。於是，政府陷入了危機。結果，片山政府撤回了預算案，鈴木宣佈辭去預算委員長的職務，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遂暫時獲得妥協。但是，由於輿論的激烈反對，如果內閣繼續戀棧，將使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思想——議會第一主義本身，有被國民全面否定的危險。所以，片山內閣以應負黨內對立的責任為藉口，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宣佈總辭職。

一般人批評片山內閣在執政八個月中是以“無為無策”而始

終。但是片山內閣決不是“無爲無策”的。第一，它用新物價體系，藉着極端地降低實際工資，使工人陷於貧困。第二，它藉着統制種稻數量、強制徵糧、低米價，使農民陷於貧困。第三，它藉着不分配資金、資材，使中小企業陷於沒落。再加上重稅和糧食不足，除壟斷資本家和地主外，名副其實地實現了對全體國民的“勒緊腰帶生活”。所以，片山內閣的最大“功績”是從事分裂站在日本民主化前鋒的工人階級，是藉着向工人階級傳播經濟主義、勞資協調、避免鬥爭之類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去挽救陷入危機中的壟斷資本。實際上，在片山內閣之下，曾把半官半民的“統制會”或“營團”<sup>①</sup>組織成爲官營的“公團”；又藉着發給價格調整費、提高貸款標準、開始斡旋日本銀行貸款，和大量發放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使壟斷資本逐漸與國家權力密切結合起來，得以鞏固其重振旗鼓的基礎。唯其如此，所以民主黨總裁蘆田在一九四七年年尾才讚美道：“總之，使勞動攻勢僅限於這種程度爲止，這是片山內閣的功績”（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赤旗報”）。並且，由於這些措施，才使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底能夠宣佈：“重建日本金融機關的準備業已完成”（“朝日經濟年誌”，一九四七年）。

因此，不能不說，片山內閣是符合了麥克阿瑟的期望的。

## 第二節 第二〇一號政令

### 一 事實上的媾和——“遠東兵工廠”政策

從一九四八年初起，美國的对日政策就進入了新階段。

首先，這時候，日本軍事基地化的第一階段工作已大體完成

<sup>①</sup> 統制會或營團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戰時的半官方經濟統制組織，例如“纖維統制會”或“食糧營團”之類；片山內閣時把它們改稱爲“纖維貿易公團”和“食糧配給公團”。——譯者

了。這種情形，僅僅從財政方面也可以看出來。日本自投降以後，按照佔領軍的命令，一直負擔了以戰爭結束處理費為名義的、佔日本預算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四六年度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四七年度為百分之三十一點七）的佔領費。在純佔領費中，工事費的比例雖然在一九四六年度佔百分之四十五，在一九四七年度中佔百分之三十七點三；但是在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百分之十九點六，在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七點四。並且，佔領軍所使用的物資數量是非常龐大的，其中水泥一項，佔領軍所使用的在一九四六年度佔日本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五，在一九四七年度也佔百分之四十五點二，但在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七點三，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五。與此相同，銑鐵管的比例，在一九四六年度實際上佔日本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一，一九四七年度也佔百分之七十七；但一九四八年度減少為十四點一，一九四九年度減少為百分之五點九。與此相反，人事費、勞務費、物品維持費的比例，從一九四八年度起却急劇地增加起來（經濟學全集，風早八十二：“戰後國家財政的實體分析”）。僅僅看看這類情形，就可以認為日本軍事基地化的第一階段，在兩年半中已大體完成了。

並且，一九四七年底，美國的对日“媾和”談判失敗了。

為了製訂如前所述的“並非意味着完全緩和指導和管理”的“和約”，為了製訂以保障美軍（聯合國軍）為條件的对日“和約”，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正式發表聲明，建議召開对日和約預備會議。但是，美國政府為了使條約內容符合於它的要求，顯然拋棄了為戰時各種協定以及最後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協定中所明白規定的、應根據四大國（中、蘇、美、英）的一致（包括否決權）原則和取得所有交戰國同意來製訂全面和約的方式。也就是否認了四大國的否決權以及採取由遠東委員會十一國起草和約草案方式的建議。

苏联和美國政府交涉和討論後，探明了這種方式的意義，於是主張應按照莫斯科協定，根據四大國一致原則，由遠東委員會起草和約。美國政府認為保留否決權就不能使和約早日實現而加以反對。苏联於是反問，不正是因為根據大國一致原則，才使對意大利、芬蘭、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的五國和約得以早日實現，並在頭年簽字，且已批准了嗎？而英國、法國也並未表示強烈支持美國起草方式的態度。

但是美國始終不同意改變起草方式，不僅不承認大國一致原則，反而採取了放棄從速對日“媾和”的政策。美國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最後中止了這種交涉，並從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外長會議議程中將日本問題除外了。

雖然最早提倡對日“媾和”的“名譽”也許可以歸之於美國，但歸之於它的，只是最初就提倡用否定全面媾和方式的起草條約辦法來造成蹂躪波茨坦公告內容的“媾和”的“名譽”罷了。

於是，美國政府在它所企圖的對日“媾和”交涉失敗後，迨至朝鮮戰爭爆發前大約兩年之間，關於對日媾和從未再有所建議。不僅未曾有所建議，並且對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莫洛托夫聲明，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間維辛斯基所提倡的、即苏联經常提議的促進對日媾和的呼籲，既不交涉也不商談就一概加以拒絕了。

美國所採取的政策是使日本處於所謂“事實上的媾和”狀態，而繼續把它置於美軍的佔領之下。

此外，自一九四七年年中起，由於馬歇爾計劃，美國把“援助”的重心放在歐洲了。而且美國對於迅速發展起來的亞洲民族運動也感覺有加以壓制的必要。再加上對日“媾和”的停頓和“事實上的媾和”的主張，於是美國放棄了摧毀日本軍需生產的方針，貸款給日本，欲使日本藉着美國的“援助”而儘早得以“自立”。所以，把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政治經濟基地的政策，也就逐步實現了。例如，我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初看見了美國眾議

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和以緩和賠償爲目的的斯揣克調查團的訪日(八月)等；而在一九四八年初就由陸軍部長羅雅爾的談話正式表明了以日本作爲“遠東兵工廠”的政策；接着在一月二十一日，由麥考埃少將在遠東委員會中提出日本復興計劃的建議；三月九日，斯揣克委員會發表了緩和賠償的聲明；三月十三日，國務院和陸軍部發表了緩和禁止經濟力集中的聲明；此外還有國務院政策設計處主任喬治·凱南(對蘇“遏止政策”的設計人)和陸軍部次長特萊伯等的訪日。

關於美國新政策的意義，從最初用美國政府名義正式發言的陸軍部長羅雅爾的話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在欲將日本大規模地非軍事化的初期政策和欲將日本建設爲自立國家的新政策之間，曾發生過矛盾。”因此，新的“對日佔領政策的方向，在於培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其目的不僅是使日本本身能夠自立，並使日本在今後對遠東可能產生的新集權主義(指共產主義——作者)的威脅發揮防波堤作用上，成爲非常強有力的、安定的民主主義”(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羅雅爾在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的演說)。

於是，日本在被佔領的狀態下，以武力強制它成爲美國在亞洲軍事和經濟據點的所謂“事實上的媾和”政策、“遠東兵工廠”政策，就有意識地從此開始了。

## 二 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民主化同盟的產生、 蘆田內閣的成立

成爲打倒片山內閣中心原動力的工人攻勢，在片山內閣辭職後也沒有弛緩下來，却進而成爲戰後最大勞工運動的“三月鬥爭”了。

全官公廳的各工會，除國營鐵道工會以外，全遞信從業員工會以各支部爲單位採取了揭發鬥爭、反徵稅鬥爭，並以要求地區

津貼等形式進行鬥爭；全國財務工会採取了揭發大戶偷稅漏稅、反對大眾課稅運動等鬥爭形態進行鬥爭；同時以它們為中心，連教職員和大藏省官吏都包括在內的非業務的官公吏也被動員起來，參加了以要求生活補助費和維持最低工資為目的的大規模鬥爭。在私營企業方面，以電氣產業工会、全日本運輸工会、東京芝浦電氣工会、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全國煤炭工会等為首，展開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爭議。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甚至屬於日本工会總同盟中被稱為最落後工会的全國纖維產業工会同盟（簡稱“全纖維”），也發表了鬥爭宣言。其間，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鬥爭也高漲起來了。作為這個戰綫的統一組織，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產生了由全日本產業別工会會議、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官公”）及中立系統的二十個工会所組成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共同鬥爭委員會。像印刷出版業工会等，曾經通過對修改勞工法規用總罷工進行鬥爭的決議。

隨着鬥爭的高漲，分裂主義者進行破壞的餘地被縮小了。甚至被民主化同盟掌握了領導部的國營鐵道工会，由於受下層廣泛展開的地區和工作崗位鬥爭的壓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也被迫不得不發表了鬥爭宣言。於是鐵道當局在二十四日答應將三月份的工資提前於二月中發給。當時，雖然國營鐵道工会的幹部立即下令中止罷工，但基層組織為表示不滿，以札幌、香川等地的支部為首，却進入了實際上的罷工。就拿武藤武雄所領導的、在十月間破壞了全國煤礦工人的統一、退出了煤礦工会全國協議會的日本煤礦工会同盟來說，雖然煤礦業聯盟（資本家團體——譯者）一面對“產別”系統的全國煤炭工会以停止地區鬥爭作為進行談判的條件，一面對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答應無條件進行談判並提出改訂工資方案；但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對於資本家所顯示的特別友好態度，却由於基層大眾不滿的壓力，而不得不加以拒絕。並且它對於各現場所開始的、全國煤礦工人

的事實上的共同鬥爭，也不能不加以默認。

對於這種工人運動的高漲，如果由日本工會總同盟、“國鐵”、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等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所進行的分裂工人階級的活動歸於失敗時，美軍總部似乎認為那就只有對於站在私營企業工會前鋒的“產別”、及站在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前鋒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分別從其內部進行破壞了。美軍總司令部勞動教育班長德微拉爾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發表談話說：我們希望與其由各企業的組織不如由各行業的組織來組成全國性的同業工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朝日新聞”）。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科長凱倫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宣佈，美國行業工會、並且是分裂世界工聯中心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在一九四七年的大會上曾經決議：為使日本工人運動“確立為民主的（反共的）工會，誓予以全面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每日新聞”）。美國勞工聯合會根據這次大會的決議，曾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花費兩個月的時間和一百萬美元，使法國的石島派從法國總工會中分裂出來。從這件事看來，當然可以認為他們對日本也從十月起立即開始了同樣的活動。何況在日本，不要說是一百萬美元，就是一萬美元，當時的黑市價格已達五百萬日元以上，因此，在收買費低廉的日本，這筆款子可以說是非常充裕了。

組織產別民主化同盟的工作，是以“產別”事務局長細谷松太為中心來進行的。細谷以事務局長這一書記的身份，竟違反“產別”大會關於二·一總罷工的決定，和日本工會總同盟一樣對此加以抨擊，並在“產別”中散佈不應舉行二·一鬥爭的意見。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產別”臨時大會中，當他的這種意見受到批判時，他便立即辭掉事務局長的職位；於是，他一面與在全日本運輸工會中成立的“日通會”、與在電氣產業工會中成立的“綠會”等反共組織採取聯絡，一面積極進行美軍總司令部所希望的

分裂“產別”的活動。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左右起，分裂“產別”的工作特別活躍起來；甚至在“產別”最強有力的工會全遞信从业員工會中，也組成了民主化聯盟籌備會。但是，他們認為沒有充分時間組成下層組織，需要在“產別”內立即發動一個全面分裂的活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在片山內閣總辭職的那天），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有澤廣己、高野實、細谷松太五人曾舉行會議，決定大綱，十三日即匆促組成了產別民主化同盟，並於十四日發表了聲明書。但聲明書並非当着下層工會面前發表的，而只是当着從旁援助分裂“產別”的讀賣、廣播第二工會等中立和御用工會，以及日本工會總同盟，國營鐵道工會反共聯盟等幹部面前發表的。

正如從這種組成經過所看見的一樣，產別民主化同盟是以非工會會員細谷為首的六名事務局局員作為領導部而組成的。它和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不同，差不多沒有可供指揮的下層工會。產別民主化同盟在口頭上主張工人階級的統一，並曾聲明它“不是反共的”。但是，正如它的聲明書中所說的一樣，它的目的是“排除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企圖使產業別工會民主化”。而且它假藉“產別”大會的決定是出於共產黨組織的活動為理由，想利用不服從大會決定是“民主主義”來分裂工人運動。所以，這就表示出來，它的行動也是和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及其他“民主化”同盟完全一樣。毋寧說，它和過去的民主化同盟的不同之處，只是假藉統一的名義，以自己為中心，要求其他組織加入它，而在經常以分裂工作為它的唯一信條上更前進了一步。這一點從下述的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來。“產別”在看見聲明書後曾召開“產別”幹事會，當會上要求民主化同盟在下屆執行委員會開會前暫緩從事活動時，他們因為無話可說只得表示同意，但立即又以不能遵守此言為理由提出辭職。於是他們瘋狂地向分裂工作前進，甚至連攻擊“產別”的藉口都拋棄了。

這種產別民主化同盟的產生會使統治階級高興到什麼程度呢？這只要看一下所有的御用報紙立即把它當做大新聞，還把自稱為“仍是共產主義者”的細谷松太（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已被共產黨開除，後來他加入了社會黨）的談話，連日在第一版上大事刊載就可以明白了。並且，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動科科員胡佛承認：“據民主化同盟迄今所說的話看來，它是健全而有效的組織”（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勞動科科長凱倫讚美說：“我們最感覺欣慰的是，最近日本各工會一面抵抗着錯誤的政治組織的支配，一面自動地致力於民主工會的活動”（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從這些話來看，也就可以明白統治階級是怎樣高興了（樋口泰一：“美軍總司令部的勞動指導方針”）。

“產別”以外的反共分裂主義者也一齊從外部來援助產別民主化同盟。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的武藤，國營鐵道工會民主化同盟的齋藤，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原虎一，讀賣新聞職工工會的渡辺文太郎等著名的反共分裂主義者，對於“產別”幹事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即請產別民主化同盟暫緩活動——譯者）曾聯名提出抗議。產別民主化同盟最有力的協助者是社會黨左派的鈴木茂三郎、加藤勘十和日本工會總同盟左派的高野實。就個人方面說，舊日本工會總同盟時代是加藤的部下、和高野實同事的細谷；擔任加藤靜枝（加藤勘十之妻——譯者）的選舉事務局長的喜田；曾做過鈴木的政治經濟研究所所員的落合；他們作為產別民主化同盟的三巨頭，也分別和加藤、鈴木、高野保持密切的聯繫。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工會總同盟的幹部曾指令下層工會對產別民主化同盟表示歡迎。這些反共工會的幹部曾集合起來，舉行了工會民主化運動懇談會，把它當做分裂勞工運動工作的中央聯絡機關。

但是這類分裂工作也未能壓制住在三月鬥爭中高漲起來的勞工運動。例如在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內的民主化同盟工作上，

雖然把担任“產別”副議長的光村拉進來，並在二月二十三日組成了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民主化聯盟，但立即受到鬥爭中的工會會員的批判，而陷於癱瘓狀態。就是專為頌揚戰後日本工人運動中“民主化”(反共)運動意義而寫的、由勞動省在一九五二年所編輯的“資料勞工運動史”中，甚至也承認當時的民主化同盟會陷於苦戰之中。

激烈的勞動攻勢阻礙了民主化同盟的產生和發展，與此同時，中小工商業者 and 農民的反對苛稅運動，教員學生的復興教育鬥爭等也高漲起來了。這就使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日益加深，於是發生了在片山內閣總辭職一月後還不能成立繼任內閣的政治危機。

建立民主日本的人民鬥爭愈向前發展，統治階級就愈努力把保守反動勢力團結起來。於是，自由黨企圖和幣原等的同志俱樂部聯合起來，組織自(由黨)民(主黨)兩黨合作的保守統一政黨，組成不包括社會黨左派在內的政權，以便對人民的勢力進行壓迫。在民主黨中雖然有一部分(太陽會)人響應這種活動，但作為該黨主力的蘆田派，却企圖在民主黨的領導下，把國民協同黨、社會黨，可能時並將一部分的自由黨也包括在內，把未被視為右翼政黨的保守勢力團結起來，來阻止共產黨的抬頭。正如後來在“非法財產處理委員會”中所暴露的一樣，為了這種目的，自由黨會利用甚至目的在使戰犯兒玉譽志夫上台的辻嘉六的獻金，利用民主黨總務原侑負有責任的非法出賣印花布的款子，利用幹事長大野伴睦主持的、對昭和電工及土木建築業者給與貸款和便利等而得來的款子，利用吉田的女婿麻生從北九州工人身上榨取的款子等，來收買民主黨的議員。民主黨也毫不後人——毋寧說，由於民主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弄錢更為方便——正如在“非法財產處理委員會”中所暴露的一樣，它藉着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藉着對土木建築業者的預付款項及其他

办法；首相蘆田不用說，從大藏大臣栗栖、大藏省次官以下一直到國會議員止，都把國民的稅款大量裝進腰包。民主黨爲了和自由黨的分裂活動相對抗，並努力從事拉攏社會黨的活動。特別是後來使蘆田不得不進小菅看守所的那筆款子，可以說是直接地阻止了民主黨的瓦解。社會黨右派一面壓制提倡不參加聯合政權的最左傾分子，一面與希望參加政權的左派幹部相結合，把社會黨引導向贊成蘆田出任首相的方向。最後，由於保守勢力的意見不能一致，舉行了決戰投票，遂使蘆田當選爲首相。於是，由民主黨佔七名、社會黨佔八名、國民協同黨佔二名大臣所構成的蘆田內閣，作爲中間路線政治的延長，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成立了。社會黨左派的加藤（勞動省大臣）和野溝（國務大臣）之所以會入閣其目的是爲了平抑國民的不滿，這是頗值得注意的。爲了與此相對抗，同志俱樂部和自由黨合併組成了民主自由黨。於是，促使保守勢力結合起來的人民鬥爭，相反地又阻礙了保守勢力的一致。

### 三 三月鬥爭

蘆田內閣一上台就聲明要吸收外國資本，努力穩定經濟。以前曾要求廢除四黨協定的社會黨左派幹部，這次對於和友黨締結三黨協定却異常熱心。他們通過鈴木所提出來的三黨協定草案的內容竟和蘆田一樣，也就是說：“依靠外資的積極援助，以求根本處理通貨膨脹及將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是一切施策所應集中之點”。無論是民主黨或社會黨，都是迎合美國的对日新政策的。但爲了吸收外資，又需要些什麼條件呢？據栗栖在就任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後對新聞記者團說：“作爲吸收外資的前提，必須完成企業整頓和使勞資協調”（見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各報）。爲了穩定經濟和停止通貨膨脹，雖然蘆田內閣以一九四八年初以後減少了通貨的流通量而自傲，但實際上這是依靠一九

四七年年底開始急劇實行大量徵稅，即靠每月強制徵稅三百億日元（如果把它與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六個月中徵稅四百億日元相比較，就會真正懂得為什麼這是和絞刑一樣厲害了）來無理地實行了通貨緊縮政策。也就是依靠這種沉重的賦稅和人民生活的貧困來降低了國民的購買力。換句話說，蘆田內閣是預定了以苛捐重稅、整頓企業、勞資協調、國民的貧困，來為吸收外資製造基礎。於是，蘆田內閣由於名副其實地實行以上的政策，而得到了“梆梆內閣”<sup>①</sup>的綽號。

但是，蘆田內閣一成立，就要來挽救它的危機了。因為三月鬥爭已全面開始了。

蘆田內閣在成立後，立即將薪給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案通知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想藉此來中止罷工。這個建議案，是根據統計局遠為低估了的私營企業的平均工資為標準，再把公營企業工人的勞動時間按六·六小時計算，而決定出來的所謂二千九百二十日元基準的低工資水平。此外，這個建議案還為工資體系帶來了職務等級制。這種職務等級制的工資體系是一種厚上薄下的薪給制度（最高和最低的比例，從相差六倍半變成了相差十五倍）。不僅如此，它的目的是藉着把職務等級制這種身份等級的新勞動體系帶到工廠車間，使車間中，使車間和車間之間，發生等級的對立；特別是使下層工會會員，一面在各車間陷於孤立，一面在各車間中，通過上級而層層受壓迫。並且，根據這種職務等級制的工資體系，其辦法是，雖然提高了基準，但受惠的是上層的工人貴族，下層的一般工人的工資却增加得有限，還企圖藉此來分化工人。

雖然國營鐵道工會因為民主化同盟幹部佔多數，表決時以

<sup>①</sup> 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以美國兵為對象的妓女，被稱為“梆梆女郎”，此處的“梆梆”兩字本此。——譯者

微小差額决定了接受這個建議案；但全官公廳的其他工会却拒絕接受。它們在答覆政府時，曾提出妥協方案，即如果根據從前的工資體系，把新基準作為臨時薪給時它們可以接受。但政府拒絕了這個妥協方案。於是問題業已從工資基準轉移為職務等級制上了。

政府蔑視集體談判權，為使新工資體系完成立法手續，將“關於政府職員薪給等的法案”和追加預算一併提交議會，經議會匆忙通過後，立即開始按此項辦法單獨對國營鐵道的職工支付薪給。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雖然提出了根據從前的工資體系按照二千五百日元的計算標準支付薪給，其餘問題移歸集體談判的最後妥協方案；但勞動大臣加藤經與美軍總司令部商談後，仍拒絕了這個方案。

全官公廳各工会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擴大委員會，認為政府缺乏誠意，宣言以實力進行鬥爭。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在二十五日舉行了二十小時的罷工。全遞信從業員工会从二十六日起舉行了各地方單位的罷工。非現業的職員工会，也一齊採取了請假戰術。像主管收稅的全國財務工会，把美軍總司令部的屢次“勸告”和“忠告”認為並非正式命令而置之不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会會員都一齊採取了請假戰術。黔驢技窮的日本政府，於是通過勞動大臣加藤，請求社會黨進行斡旋。社會黨接受此請，並通知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進行斡旋。全官公廳工会聯絡協議會雖然答覆願以撤銷職務等級制為接受斡旋的條件，但因國營鐵道工会民主化同盟、“產別”民主化同盟、全遞信從業員工会民主化同盟等的走狗幹部，通知社會黨，要求斡旋得到較國營鐵道更為優厚的待遇，於是使社會黨幹部進退兩難無法措手了。

其間，電氣、煤炭、機器、纖維、土木建築及其他私營企業中的鬥爭也高漲起來了。“產別”曾要求政府作妥善的處理。“產

別”下面的全日本機器工會，爲了援助官公廳勞動者的聯合鬥爭，通過了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的決議。當時，共產黨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發表聲明，正式號召國民“爲和平、民主主義和民族的完全獨立”，“組成民主民族戰綫”。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擴大委員會，決定自三月二十九日起把鬥爭擴大及於全國。於是，遵照此項決定，全官廳工會協議會決定從三月三十日起在十三省（即十三部——譯者）舉行四十八小時的請假罷工；日本自治團體工會總聯合會指令從三月二十九日起開始行動；像東京交通工會之類，則業已從三月二十七日起就進入了無限期罷工。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成爲三月鬥爭中心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動向。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把地區鬥爭滙合起來，在中央的指令之下，爲給政府以最後打擊，曾指令從三月二十九日起把全國劃分爲東西兩部，分別舉行罷工；從三月三十一日起則進入全國總罷工。於是，三月二十九日，日本東部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十五萬工人舉行了罷工，使三月鬥爭達到了最高潮。

這個三月鬥爭的規模究竟有多大，並且，它對統治階級的打擊究竟有多重，這只要和以前被稱爲日本歷史上最大工人鬥爭的一九四六年的十月鬥爭比較一下，就很顯然了。這次參加罷工的人員達八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十八人（一九四六年十月爲十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八人），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數達二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八日（一九四六年十月爲一百六十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日）（根據勞動省公佈的數字）。

日本政府和社会民主主義者幹部已無法來收拾這種事態了。於是就在這時候發表了馬貴特備忘錄。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美軍總司令部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少將以備忘錄通知日本政府，認爲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罷工應該適用二、一總罷工的禁止令；同時並對全國財務工會

發出了禁止罷工的直接命令。日本政府得到了这种助力，於是公佈禁止非業務官廳的爭議行爲，三月三十日，搬出“官吏懲戒令”这种違反勞工法的舊法律，對全國財務工會幹部給以處分。但是日本的工人已較二·一總罷工當時更前進一步了。以至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國財務工會爲首的現場和非現場業務的全官公廳勞動者，改行採取地區的和工作崗位的分散鬥爭，並繼續實行了請假戰術。三月三十日，馬貴特又發表聲明，凡公營事業，不管是採取地區罷工或其他形式，只要是和某種企業有關的類似罷工的行爲，都視爲是總罷工。這也就是完全禁止公營事業罷工的命令。

這一絕對命令，遂挽救了剛剛誕生就要喪命的蘆田內閣。

#### 四 吸收外資政策

日本壟斷資本，對於以日本爲“遠東兵工廠”的美國新對日政策，採取了無條件加以歡迎的態度。支持民主黨的、有勢力的壟斷資本家團體的經濟同友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發表聲明，“希望無限制地吸收外資”。

當決定對日經濟政策的美國陸軍部次長特萊伯等人訪問日本時，蘆田首相曾請求借款十億美元，在美方對於這個請求的答覆中則顯示了它的明確條件。“陸軍部次長和盟軍最高統帥所極力主張的一樣，他強調日本維持預算上的收支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說：關於美國今後將給（日本）以何種程度的援助將由欲自力更生的日本人在重要物資的增產、國外貿易的復興、平衡預算的實現等進步程度上所表現的努力、創造和勤勉的記錄和證據而決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美軍總司令部特別公佈）。

爲了滿足這種吸收外資的三項條件，蘆田內閣曾傾注全力於“修正資本主義”。

第一，爲了“重要物資的增產”，它把片山內閣以來的“重點主義生產”方式，加上民主黨綱領中的“超重點主義的經濟重建方策”而叫做“集中生產”，採取了培養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例如，在一九四八年度，鋼鐵業以價格調整費的名義把國家預算中的百分之五以上裝進了私囊；此外，還讓他們以較一般產業的公定價格遠爲低廉的公定價格，得到了輸入原料和煤炭的配給。據說鋼鐵業從國家手中所獲得的利益，其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集中在五大製造商之手（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中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

第二，關於“國外貿易的復興”，日本政府和美軍總司令部合作，爲購買高價的外國商品採取了下列政策，即從日本國民的稅款中付出龐大的輸入價格差額補助費，並將輸出因工資低而價格廉的日本商品所得到的款項劃入貿易基金。也就是說爲購買佔日本總輸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價格高昂的美國商品，採取了把幾佔輸出中百分之七十的商品向亞洲市場傾銷的、壟斷資本主義本位的振興國外貿易政策。大藏大臣北村解釋說，這種低工資正是振興貿易的基礎；他說：“日本過去之所以能夠如此者，還不是由於成本低廉嗎？總之，這是由於人工費便宜的緣故”（“東洋經濟新報”週刊，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號）。於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所發表的經濟安定本部復興計劃中，就認爲必須將這種饑餓輸出比頭一年增加九倍了。

關於第三項條件的“平衡預算”，蘆田內閣在幾近三個月中都未能編製成預算，經用暫定預算度過這個期間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才向議會提出正式預算，而自稱是“爲吸收外資的平衡預算”。的確，賬面上的收支是相等了。但是，爲此却將賦稅比頭年（一九四七年）提高了近兩倍，這也是把重點放在間接稅上（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率從一九四七年的四十九對五十一變成了四十四對五十六）。新設立了營業稅這種對大眾的徵稅，並將鐵路

運費提高了三倍半，將郵費提高了四倍。此外，僅僅爲了一億五千萬日元的歲入，把不實行半工半讀就不能上學的學生的學費，一舉而提高了三倍半。這顯然是採取了盡量向大眾徵稅的方針。另一方面，政府說是爲了吸收外資和積累資本，大大降低了向壟斷資本徵收的公司稅。而且，陷於危機中的壟斷資本，它唯一的財政經濟對策就是通貨膨脹政策，於是以佔領費、價格調整費、復興金融公庫及其他政府出資、交付公債等形式，業已將通貨膨脹包含在預算本身中。並且在政府本身的歲出項目中已列入價格補助等特別補充費的項目，這就表示它們顯然預見到了通貨膨脹的繼續發展。一言以蔽之，一方面藉通貨膨脹來掠奪國民，一方面又藉徵稅和政府對中小企業的延期付款來阻止通貨膨脹，這種雙重的掠奪政策就是“平衡預算”的實質。

所以，蘆田內閣是忠實無比地服務於“遠東兵工廠”政策的。憑藉這種政策，日本的壟斷資本才能够使它的重建工作着着前進。在機構方面，壟斷資本的代表，利用直接參加“公團”、配給審議會和官廳中，而使國家權力從屬於它們。就壟斷資本的團體說，因爲只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作爲地區和各行業的資本家團體的聯絡機關而成立的經營者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還嫌其領導力量太薄弱；於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成立了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簡稱“日經聯”）這一壟斷資本的中央指導機關。並由它專門從事領導資產階級對付工人運動的政策。這一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成立後，立即開始向日本政府及美軍總司令部提出了它的意見書，這可以看做是日本壟斷資本恢復了自信的證據。

但是，這類從屬於美國的、壟斷資本本位的經濟政策，只有在犧牲國民生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日本工人由於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攻勢的鬥爭，雖然使勞動條件有了若干改善，但是好容易增加的工資，却不能趕上由於通

貨膨脹的物價上漲。即使根據官方的統計，家庭生活費中，在一九四八年四月為止已有百分之七一八的虧空，而飲食費在家庭生活費中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日本勞動年鑑”第二十三集）。但是，這類的數字還遠不能表示出實際生活的貧困程度。爲了抑制工人的不滿，在都市中的配給遲發現象雖幾乎沒有了，但這種足額配給是大量地以大豆渣、乾杏子、甚至以砂糖當做主食來配給的。哪一個國家會命令人類把像螞蟻一樣的東西當做主食呢？那末，既然是人，就不得不到黑市去買了。但這種黑市，政府又用警察力量來加以禁止。於是黑市價格，特別是主食的黑市價格就上漲起來。家庭生活費中，飲食費所佔的比例幾達戰前的兩倍。但所謂戰前，乃是以“比印度工資還要低”而著名世界的、日本工人階級所處的狀態。不僅如此，即使根據經濟安定本部的推算，當時已有四百萬名的失業者（一九四八年五月、經濟復興計劃第一次試案）。但實際生活水準是應該將這種失業期間也計算在內的。因此，如果以這種失業期間平均計算，那就顯然可見，日本工人真正是被迫處於動物以下的生活狀態。

它們對於抵抗程度比工人爲低的農民，曾給以較工人更爲嚴重的打擊。徵購是以所謂“徹底徵糧”，按照攤派額強制收購農民所有的大米。遲發配給從都市移至農村，造成了山梨縣遲發配給五十日，秋田縣遲發配給六十日的最高紀錄的現象。加在農民身上的賦稅負擔，相當於一九四七年的兩倍。地主的攻勢日益增劇，收回土地的事件在各地都大量發生。“土地改革”也按照地主本位的辦法進行。例如首相蘆田就被當做在村地主（假借暫時離村的名義），決定了他可以不交出土地。在生產得愈多就被掠奪得愈多的佔領制度下，勤勞的日本農民也不得不採取放棄耕種的最後手段了。即令根據農林省的調查，一九四八年夏季，三萬戶以上的農民，放棄耕種的田地達二萬五千町步以上（據“日本農業年報”第二集、第三集）。

對於抵抗程度比工、農更微弱的中小企業家，則壓迫也就更為厲害。於是集中生產、平衡預算、貿易第一主義，就變成了減縮資金和資材的配額，增加賦稅負擔和延遲政府付款，而給中小企業以威脅。此外，由於吸收外資加強了壟斷資本的支配，遂使中小企業陷入危機。例如，作為第一次的對日借款，在四月底發表，在六月初付諸實行的六千萬美元的棉花週轉基金，其條件是以所購棉花的六成作輸出之用。因此棉花的配給就完全集中於壟斷資本，致使濱松、丰橋等地的中小企業陷於崩潰狀態。雖然外國的私人投資還甚少希望，但是第一筆私人投資——對日新化學工業公司的外國資本，僅僅是以提供專利權和技術作為代價，就取得了該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日本經濟新聞”）。即令是在日本的傀儡政府汪精衛政權之下，也限制外國資本不得超過全部股額的百分之四十九。居然逾越這種比例，要求企業的完全控制權的是美國資本；而為了希望獲得利潤不惜出賣民族產業的，則是日本的壟斷資本家。

於是當蘆田內閣的全部政策顯然是意味着對國民生活和對民族產業的破壞的時候，首先是工人階級站起來和它進行了正面鬥爭。

馬貴特的聲明，並未能使日本的勞工攻勢發生如二·一總罷工後一樣的退潮。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工人，在這個聲明以後，仍然勇敢地進行了先後有二十個支部，人數達四千五百名的罷工。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雖然由於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長凱倫的禁止命令，中止了這一罷工，但是這種不屈不撓的鬥爭，却激勵了全官公廳的各工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雖一齊接受了在新薪給委員會成立前作為暫定措施的政府方案，但是另一方面，却成功地使政府接受了它所一直強硬拒絕的三項條件：（一）不許解僱工人，（二）付給罷工時的工資，（三）不得修改勞工法規。從四月起，私營企業的勞動

攻勢日益激烈起來。在四、五、六月間風起雲湧的罷工波濤，雖不及三月鬥爭之大，但除三月鬥爭外，規模之大也是日本勞工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別充分表現出這時期的鬥爭特徵的，就是“東寶”電影製片廠的勞動爭議。“東寶”的經營者為對具有強有力的工會並取得了模範集體合同的“東寶”職工進行挑戰，特聘請自由黨的落選議員候選人渡邊鏡藏為經理，並以和勞工方面有關的官吏馬淵、北岡等為董事。他們在高唱企業合理化、整頓虧損、片面宣佈集體合同無效後，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發出通告，解僱職工二百七十名（包括大部分工會的幹部）。對於這種挑戰，工會方面要求製定具體的製片廠復興計劃，並撤銷解僱；但經營者却加以拒絕，明白表示了一如經理渡邊所說的：“即使製片廠長滿野草”也要鬥爭到底的態度。這種強硬態度的背景是：第一，正如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立即支持這種資方攻勢所表現的態度那樣，日本壟斷資本採取了全面支持“東寶”經營者的態度把這當做對勞動攻勢作全國性反擊的第一步；第二，由於資方認為根據利潤本位的經營計劃，應取消攝影廠，改為租賃電影攝製場，上演美國影片，實行“企業合理化”和“整頓虧損”；並自信藉此還可以獲得美國資本的援助。但是，按照這種政策，則攝製了“戰爭與和平”、“再來一次”、“光輝的星期日”、“泥醉的天使”、“兒童會議”等傑作，簡直可以說是攝製了日本投降後一切優秀影片的“砧攝影所”，就要被摧毀，它的攝製幹部就要被解僱，而代替它來充斥日本各地的將全是色情、荒誕和美國西部片。“東寶”的職工，一面對侵犯勞動權作猛烈的反擊，同時還組成“保衛日本電影會”，組織工農和市民，對破壞民族文化的政策進行反擊。於是，開始了五七個月之久的東寶罷工鬥爭。

## 五 警察制度的復活

對於這類勞資的正面衝突，在馬貴特聲明以後，整個政府機關把勞工運動視為敵人，開始了殘酷的鎮壓。

為此，對警察機構進行了整頓。

根據波茨坦宣言，佔領軍當局對於作為警察國家、在世界上臭名遠揚的、日本戰前的警察機構，負有破壞的義務。但是美軍總司令部在兩年多中並未實行這項義務。如前所述，美軍總司令部一面在形式上廢除了特高警察，一面則把它当做美軍總司令部諜報部的輔佐而加以保存。此外，還藉口日本軍隊已被解散，反而容許日本政府將警察的數目從戰前的五萬六千人擴充為九萬三千人。

此外，應該與軍隊同時立即解散的內務省也被保存下來。負責設計警察民主化的警察制度審議委員會的委員長，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同意，竟由內務省出身的官僚政治家、戰時強制疏散東京都市民、使人民陷入戰禍中的大久保留次郎擔任。這當然使警察的民主化不能實現了。甚至為改善都市警察機構而訪日的美國華倫丁代表團，也認為如果不立即使行政事務脫離警察事務，如果不將每八百戶一名警察的數額至少減為每二千戶一名，那麼就不能解除人民的壓迫感覺，從而，也就不能使警察成為人民的公僕（見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日本各報）。

使消防隊脫離警察而獨立是一九四七年一月的事；製定裁判法使司法權僅在形式上獲得獨立是同年五月的事；將內務省的警察事務移交給總理大臣直轄的公安廳是同年六月的事；而指令警察民主化的麥克阿瑟信件，則是日本投降兩年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才發出的。於是，好容易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才頒佈警察法，解散內務省（一九四七年最後一天），實施新警察制度（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但為時已在羅雅爾業已表明美國的

對日政策是停止“非軍事化”方針，“培養強有力的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後了。所以使日本警察“民主化”的目的就和停止日本的“非軍事化”是爲了重新武裝日本、使日本政府“強有力化”是爲了促進日本法西斯化完全一樣。

新警察制度使所謂“民主”警察，在它的工作中不包含統制經濟和衛生等非純屬警察事務的行政事務，在形式上取消了警察機構的中央集權制，凡人口五千以上的各地方自治單位均應成立自治警察以作爲警察制度的中心。這種自治單位的警察應服從地方議會所同意任命的警察委員的命令，而國家警察的數額限制爲三萬名，應服從國院所同意任命的公安委員的命令。

但是，這類事情本身，毫未減少警察的力量，相反地是意味着大大加強了警察的權力。首先，警察事務雖然限定爲純警察事務，但這只是意味着更加加強了作爲新警察的首要目的、即圖謀“維持公共秩序”的力量。於是，和華倫丁的勸告相反，雖然事務方面簡化了，但警察的人數反由九萬三千名增加爲十二萬五千名了。所謂地方自治單位警察，其目的不過是爲了將警察財政負擔從中央轉嫁給地方自治單位。並且，美軍總司令部當時的佔領地警察事務，主要是交給美軍地方軍政部掌管，這就使得日本警察從屬於這種維持治安的機構了。

所以，警察的中央集權制也並未取消。而且規定地方警察負有必須經常不斷把全部情報供給國家警察的義務。特別是在“國家緊急狀態”的場合，根據國家公安委員的“建議”，總理大臣具有統率全部國家警察和自治警察並對它們下命令的權限。這種對中央和地方，即對全國頒發戒嚴令的權限，即使是戰前的日本政府在法律上也是未曾有過的。不僅如此，國家警察所劃分的六個警察管區和日本在戰爭末期所劃定的六個軍管區是完全相同的。國家警察是憑藉地方自治單位警察的援助和合作來擔任維持治安工作的。毫無疑問，日本人民是處於和戰時受憲

兵、警察嚴厲統制時完全原封不動的體制下，但由於警察人數比當時多兩倍，所以受到比戰時更加厲害的壓迫。於是，國家警察本部長齋藤，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國會中明白說，已計劃在各警察管區各設一萬名特別武裝警察隊。並且警察的武裝也顯然加強了。他們被發給了美國製的手槍以代替短劍。他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手槍的，留待以後詳談，現在只先提出一件事說一下。在戰前，例如在原（敬）內閣時代，因為警察拔出了沒有開口的短劍而受到攻擊，使政府苦於答辯，不得不說是僅僅揮動了一下劍鞘。但現在則與此相反，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全國縣長會議上，首相吉田竟明目張膽地發表駭人聽聞的言論：“警察如認為應盡量不使用武器以保護人民，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此外，為協助警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還建立了鐵路警察制度。雖然消防隊和警察制度分開了，但在人事、設備和其他方面仍和過去一樣與警察保持着聯繫。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國家公安委員和消防團長的聯絡會議上，曾正式決定消防隊和警察在緊急時應取得聯繫，在“緊急狀態”下，二十萬的消防隊員應對警察進行援助。

此外，在海上，從最初起就建立了純粹的海軍。一九四八年四月製定海上保安廳法，將運輸省的掃海管船部和該省外局的水路部、燈塔局合併成為海上保安廳，下設海上保安隊從事取締偷航和走私的工作。這在名義上雖稱為“海上警察”，但第一，它的武裝絲毫不受限制；第二，它的預算內容無須得到國會的同意；第三，立即將作為賠償之用的日本海防艦二十八艘交給了海上保安隊。駐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基斯連科曾攻擊說，這種海上保安廳法未經盟國對日委員會的審議，具有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味，是直接地違反了波茨坦公告。英國代表也認為海上保安廳法未經盟國對日委員會審議是不應當的，這是他第一

次在這種會議上採取了和美國代表對立的態度。這就表示在國際上也認為海上保安隊是日本重新武裝的正式開始了。

於是，所謂警察機構的“民主化”，和美軍總司令部所實行的一切“民主化”一樣，是在國際國內民主主義勢力的壓力下，一方面在語言和形式上推行着日本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則實際是美國政府與竭力欲保存維持治安機構的日本舊統治勢力和反動政治家相勾結，使日本成為比戰前更徹底的警察國家，並更為加強了日本警察所具有的軍事性質。和戰前的唯一不同之點，只是全部警察機構及其所孕育的重建日本軍隊的萌芽，完全是處於美國壟斷資本的支配之下而已。

## 六 麥克阿瑟的信件

為了“培養強有力的日本政府”，首先必須壓迫共產黨和勞工運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把揭發大阪久保田鐵工所出賣黑市煤炭的四十六名工人交付軍事審判，這是勞工運動被付諸軍事審判的第一遭。這次的裁判後來曾以美軍地方軍政部的名義予以緩刑。但是，在三月鬥爭中，以割斷佔領軍電綫名義而被捕的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東京搬運工事局支部、國際電氣通信施設部福岡收報所、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北海道札幌地區等的負責人及當事人，除均分別被處以五萬日元至七萬日元的罰款外，還被處以一年至五年的徒刑。其中，像東京搬運工事局的鬥爭委員長山內，因為在公審庭上提出証據，証明口供是用刑逼出來的，於是認為這是反對調查官的証言，當場加處偽証罪（苦役二年、罰款六萬七千五百日元），遭受了世界司法史上前所未聞的判決（遞信省勞務局編：“遞信勞工運動史”）。

由於這種鼓勵，日本的司法機關和警察機關也開始進行暴力的鎮壓。特別是集中地攻擊資本家所最討厭的工人管理生產

的鬥爭。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實行生產管理的東京愛光堂的印刷工人，就以非法侵入罪而被捕。從四月二十一日起，對於同樣實行生產管理的日本製造打字機各工廠，在戰後第一次出動武裝警察，對工人佈置的糾察線使用暴力。特別是在佔據三田工廠時，警察隊把身上刺字、高喊：“我們是正人君子，討厭赤色份子，趕快停止罷工”的流氓當作前鋒，先行侵入，在他們被工人趕出來後，立即求助武裝警察隊，重行進攻。於是揮舞六尺棒和棍子，使許多工人受傷，並拘捕了二百幾十名工人。

但在日本，決定性的鎮壓，往往是利用排外主義以對付朝鮮人來開始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因為文部省命令朝鮮人學校應按文部省規定的學校課程進行（強制使用日語和日本教科書進行教育，否認自主教育）教學，所以朝鮮人於三月底在山口縣，四月中旬在岡山縣，分別和縣當局進行集體交涉。在神戶，縣長、市長和檢察官合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強迫查封全部朝鮮人學校並對抗議此舉的許多朝鮮人，由警察隊揮舞警棍使數十人負重傷及輕傷，十七日又對抗議此項暴行、擁至縣府的朝鮮人及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日本人，也揮舞棍棒亂打一通，使十五人負重傷，六十五人被捕。朝鮮人以及對這問題寄與深切同情的日本共產黨員、工會會員等，立即開始進行了前後共達二十萬人的大眾抗議。在這種壓力下，四月二十四日，縣知事答應並簽字承認撤銷封閉學校的命令和立即釋放被拘禁者。但第二天黎明，忽然用神戶美軍憲兵司令部的名義，對神戶地區一帶宣佈初次的緊急狀態。並立即以神戶市為中心，逮捕了京都、大阪、神戶一帶的朝鮮人千餘名（據旅日朝鮮人聯盟發表為一千五百七十二名，據佔領軍發表朝鮮人日本人合計為一千一百七十六名）。次日即二十六日未明，又逮捕了以市會議員堀川為首的共產黨員、各工會幹部一百三十三名。麥克阿瑟的心腹、第八軍司令官艾契柏克中將曾特意飛至神戶，親自指揮處理這一事件，這就充分

表現了未將這次事件作為地方事件來處理。並且艾契柏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招待新聞記者時，沒有舉出任何證據竟武斷地說：“這次在神戶大阪地區的暴動，顯然是由日本共產黨煽動的”。

為對這次神戶事件及對四月二十三日同樣在大阪府廳前發生的拘禁一百五十名朝鮮人和日本人的事件表示抗議，四月二十六日，立即在大阪的大手前公園舉行了抗議大會。當大會在嚴厲限制下開完後，三萬到會者的三分之二已平靜地離開會場，這時南朝鮮系的建國促進會會員突然用消防水龍向散會中的羣衆噴射自來水。同時，警察揮舞棍棒，解下手槍衝入羣衆中，除殺死了十五歲的少年金太一以外，還使數十人負重傷。殺死少年金太一的手槍是從圍牆中瞄準後開槍的。這顯然是警察的有計劃的暴行。而且更驚人的是，警察局長鈴木對調查這次事件的各民主團體代表明白斷言說：“這是有意的。跪着也會開槍，站着也會開槍。在這種情形下，警察是準備殺到一人不留為止的”。這位警察局長鈴木曾得到連縣知事也沒有的外國出品的高等汽車，並且第二年還坐了美國飛機出席在瑞士的重振世界道德（反共的世界主義團體）大會等。他之所以得到美軍總司令部的特殊優待，也許是當然的了（“產別”編：“官方暴行”）。

艾契柏克曾在四月二十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打算將全部在日本的朝鮮人用伊麗莎白皇后號輪船遣送回去，並要完全撲滅共產黨。這是利用神戶、大阪事件的機會，想一舉而將日本投入法西斯主義。

但是，阻止了這種企圖的，第一是立即在日本全國舉行抗議的朝鮮人；第二是強有力地援助此舉的日本共產黨員、工會會員；第三是和他們共同鬥爭並廣泛進行反政府運動的日本國民。各地的朝鮮人除立即舉行抗議集會和示威運動外，同時要求有使用朝鮮語教學的自由，並在日本全國接連進行了韌性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一鬥爭所動員的人數，估計前後共達數百萬人。

援助了此舉的日本人，而對着法西斯主義和民族的壓迫，也以日朝兩國國民間前所未有的熱情進行了合作。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大阪地方協會會長村上弘（共產黨員），僅以關於朝鮮人學校問題曾協助朝鮮人並發表鼓勵演說這一理由而被美軍軍政部所逮捕。但他代表日本工人階級對軍政部的訊問毅然對答如下（“遞信勞工運動史”）：

“地方協會決定了要參加（四月二十三日對縣政府的抗議）嗎？”

“是的。”

“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打算做非法行為嗎？”

“並沒有那樣的意圖。”

“難道朝鮮人可以侵犯日本的法律嗎？”

“誰使他們侵犯的，你想想它的原因看。”

“關於純屬朝鮮人的問題也要干與嗎？”

“日本勞動人民大眾和他們合作是當然的。”

“這不是叛逆嗎？”

“這是民族的自主權。”

雖然村上弘被處以四年苦役，但是這並不能夠摧毀在工人階級間所充滿的國際主義精神。所以，要求釋放被捕朝鮮人的簽名者達二百五十萬人，捐助的救濟基金達五十八萬日元。而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東京舉行的反對非法鎮壓人民大會上，五月一日在全國的國際勞動節集會上，日本工人階級一方面堅強反對官方的非法鎮壓，同時要求給“旅日朝鮮人以自主教育的自由”，這顯然是認識了“民族的危機”和“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是出於同一根源的。

隨着壓迫的廣泛擴大到國民各階層，鬥爭也就廣泛地擴大到國民各階層了。

在農村，以貧農為中心在各地展開了食米鬥爭。貧農領導

权很强的日本農民協會各支部，以對“隱瞞田地的鬥爭”來暴露地主、富農沒有申報的田地，而和控制鄉村的惡霸勢力進行了鬥爭。不僅是貧農，全國農民反政府情緒的高漲，從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東京舉行的全國農民大會上也可以看出來。因為出席大會的儘管主要是富農和中農的代表，但他們竟把社會黨左派的國務大臣野溝噓下演講台去了。

進行反對提高學費運動鬥爭的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發動了反對以大學委員會法案為中心的殖民地教育及要求復興教育的鬥爭。從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聯合罷課的學校在日本全國達一百一十三所，人數達二十萬人。為反對重稅，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中心，在各地組成了賦稅民主化同盟。為反對破壞民族文化，“保衛日本電影會”發展成了“保衛日本文化會”（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成立）。在地區方面，在反對非法鎮壓的鬥爭中，也開始出現了如像大阪的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準備會之類的反法西斯統一組織。於是，以這類的團結為中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九日，除日本工會總同盟以外的各工會，日本農民協會及其他民主團體，就和共產黨、社會黨及一部分無黨派的議員合作，組成了工農聯絡會，使議會外的鬥爭和議會內的鬥爭結合起來了。

這一日本全國國民的反抗高潮，粉碎了欲一舉將日本導入法西斯主義的企圖。而艾契柏克的大話也終於未能實現。

但是與正面的鎮壓同時並行的，還有從背後開始的進攻。例如，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美軍總司令部勞動科官員保爾·詹森就發出命令說：“各縣知事對於被選舉為勞動委員會的人具有拒絕指名的權限。而排除和取消屬於單方面的人物則是縣知事的責任。對此，司令部將全面予以援助”（勞動省：一九四七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因此，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宮城、三月在山形、四月在長野和青森等地發生了排斥民主選出的地方

勞動委員而由縣知事隨意任命委員的所謂委托職权的暴舉。甚至對於勞動關係調整法這種資本家本位的法律，資本家還意猶未足，又自己利用行政權來開始破壞他們所親手製訂的法律。

即使如此，仍然未能抑壓住國民的抵抗，尤其是站在它的前陣的勞動攻勢。於是，這就進行了欲修改勞工法規的冥頑努力。自加藤勳十就任勞動大臣後，雖然常常表明“不修改勞工法規”，但首相蘆田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上却斷然說：“像塔夫脫—哈特萊法之類的東西，政府正在考慮之中”。而勞動大臣加藤並未否定過這句話。

民主黨明確地認清了社會黨左派的作用。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的民主黨大會上，該黨政務調查會會長稻垣說：“企業自由和確保利潤對於吸收外資是最重要的條件。和社會黨進行合作在消除勞動方面的不安上比什麼都有效。雖然有人主張應將左派清除，但是如果左派實行容共和組織民主戰綫，那就非常糟糕，所以拉攏左派就是為了防止這類事情”。首相蘆田也在演說中說過：“雖然各位都害怕左派，稱之為野獸，這因為是外行的緣故；至於我們，因為會驅使猛獸，所以能充分駕馭他們”。實際上，社會黨左派首領鈴木，藉口維護三黨協定，重行就任國會預算委員會委員長，並自行解散了號稱為“黨內在野黨”的五月會。同時，日本工會總同盟退出了全國工會聯絡協議會，產別民主化同盟召開了全國大會（都在六月間），而這些事都是在社會黨左派幹部的指導和援助下實行的。甚至可以說，社會黨中對蘆田內閣應負政治責任的，與其說是右派，不如說是左派。

勞工法規之所以未被破壞，並非由於左派幹部的參加內閣，却完全由於儘管有左派幹部的入閣而仍有澎湃高漲的勞動攻勢（據勞動省發表，參加罷工的人數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達二十萬，五月達十九萬，六月達二十九萬）。

未能修改勞工法規的蘆田內閣，於是開始從不為大家注意

的方面提出了束縛基本人权的法案。

其中的第一件法律是五月一日公佈的輕犯罪法。這是代替過去的違警處罰令來處罰違反公共道德行為者的法令。除共產黨以外，所有政黨均曾對之表示贊成。共產黨認為凡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稍有妨礙的法律都是無用而有害的，並列舉過去怎樣利用違警處罰令壓迫國民的實例來加以反對。因為這種意見受到國民的支持，於是社會黨提出如下修正後，該案才在國會通過。即：“當適用此項法律時，應注意不致因此而非法侵犯國民的權利，不得越出公共目的的範圍而為其他目的濫用此項法律”。但是，自法國革命的人权宣言經過討論並闡明其意義以後，凡可能濫用來侵害國民權利的法律，在維護基本人权上從未作過一次必要的嘗試。並且凡禁止加以濫用的法律而未被濫用的例子，在歷史上也從未出現過。所謂禁止濫用的規定，往往只是掩飾鎮壓法規的遮羞布而已。像社會黨右派的松岡駒吉之類，就完全公開說：“正如在過去的時代需要治安維持法一樣，對於過火的大眾運動，這是必要的”。實際上，輕犯罪法是立即就開始用於鎮壓民主主義運動的，其後更被日益濫用，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這項法律竟被擴大應用到這種地步，警察把東京新宿高等學校的學生作為貼標語的“現行犯”，甚至用手槍從後面射擊，使他負了瀕死的重傷。雖然松岡駒吉也許對此感覺滿意，但作為主權擁有者的人民却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暴力。

第二項法律是政治資金規正法。眾議院的“關於隱匿物資特別委員會”，曾把日本投降後資本家、地主、軍人、官僚們瓜分了龐大國家財產的事情揭發出來；一九四七年底它改組為“非法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後，並對政府和政黨的收買受賄也進行了調查。這個委員會，曾暴露了從辻嘉六事件到自由黨本部和鳩山一郎的建築私宅事件以及民主自由黨方面的非法行為。嗣後，當開始揭露龜井貫一郎、土木建築獻金事件等以及蘆

田、栗栖、西尾等的民主党、社会党的腐敗情形時，遂製訂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而爲了防止這類政党的貪污腐敗，於是規定了政治团体的呈報制和政治团体的收支申報制（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通過、七月二十九日公佈）。但是，因爲這類現存政党是以政治腐敗爲基本條件而成立的，它当然不能自行消滅政治腐敗。政治資金規正法是反面利用政治腐敗的現象，假借使政界純潔化的名義，來束縛爲憲法所保障的國民的政治自由權利。其目的不僅是對於政党，特別是爲了嚴格限制政党以外的羣衆团体的政治活動。因爲這樣一來，以工会爲首的一切民主团体，如果不作麻煩的呈報，就不能夠從事政治運動了。

第三項是開始在各地製訂公然蹂躪基本人权的公安條例。首先製訂這種公安條例的是福井市和福井縣。一九四八年六月底，在福井地方發生了大震災，出現了數十萬的災民。因爲官方沒有立即採取救濟办法，於是日本共產党、工会及其他民主团体馬上組織救濟隊，進行了有效的救濟活動。官方所擔憂的不是國民生活的被破壞，而是害怕國民將希望寄託在民主团体方面。首先在七月四日，對於全遞信从业員工会會員爲便利災民在街上售賣郵票和明信片，以“違反郵政法”的名義加以逮捕。六日，對張貼颱風預報傳單事先警告災民的國營鐵道工会會員，以“違反輕犯罪法”加以逮捕。於是七日用福井市長的名義，八日用福井縣知事的名義，假借禁止“從事一切煽動言論行動”的曖昧條文，公佈了只准政党及其他各种团体或個人在官方許可範圍內行使言論、出版、集会、示威遊行權利等的公安條例。爲憲法所保障的、對於國民來說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基本人权，竟被區區的行政官吏所蹂躪了。雖然這會由縣議會和市議會所通過，但無論是國會或其他機構都無權製訂超越憲法範圍的法律。所以当各地仿效福井的例子公佈公安條例時，甚至一部分地方法院也不能不對此判決其爲違反憲法，這就是顯著的証明。

在福井地方，曾利用公安條例，大大限制了民主團體的活動。七月十日，竟命令由東京所派遣的、以共產黨議員為首的全國的民主救援代表離開縣境。

福井地方的日本官方，顯然得到了美方軍政部強有力的支持。福井的美軍軍政部長官公開說：“凡是共產主義者，不論他是什麼人，都要把他擊潰”；他還親口吹牛說：“我簡直要親自去把他們抓起來”（奧那·托勒西：“日本的悲劇、美國的悲劇”，載“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增刊號）。這類由美軍地方軍政部對日本內政的直接干涉，不僅在福井，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是露骨的。例如在埼玉縣，該地的美方軍政部就認為教師不是勞動者，屢屢向日本地方當局提出此項“勸告”，後來知道按照日本的法律不可能否認教師是勞動者，於是在七月十三日（一九四八年）由軍政部直接下令禁止一切教職員工會的活動。

但是，儘管有這類壓迫，隨着生活的日益被破壞，日本國民的反政府傾向却迅速高漲起來。其間，在各政黨中，唯有不斷打退鎮壓，從事保衛國民生活的日常鬥爭的共產黨力量在急劇增長起來。

一九四八年七月間，蘆田內閣瀕臨崩潰的危機。七月二日發生了下列事件：即包括把鐵路運費提高四倍、郵費提高三倍半在內的掠奪國民預算案，竟被號稱為社會黨“純正左派”的最左翼所反對，且為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所否決（其後該案以微小的多數在眾議院全體大會上被通過）。七月五日成立了作為全國學生組織的全國學生聯盟，當議會審議大學法案時，全國學生聯盟決議舉行無限期罷課。七月六日，副首相西尾末廣因被追究其受賄責任而辭職。七月七日，社會黨把純正左派開除出黨。但純正左派聯合未被開除的人組成社會黨正統派議員團，開始了整黨運動。七月八日，雖然社會黨發表了以所謂在十月間舉行暴力革命為內容的共產黨秘密指令，但被共產黨揭露出來，這是

連號碼都錯了的(共產黨的正式指令还不到三百號,它却填為第四百零一號)、粗製濫造的假文件。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在西方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曾受狙擊;与此相呼應,七月十九日,在東方的日本,發生了民主自由黨系反共團體分子在佐賀對德田球一投擲炸彈的事件。但是,德田球一在負傷後立即指出:“剛才在這裏所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呢?不正是稱共產黨為暴力革命的人們在對共產黨施用暴力嗎?不僅是對於共產黨,並且是對於工會和一切民主運動施用暴力。……這就表示目前正是全國國民和我黨必須共同斷然粉碎這種新的法西斯萌芽的時候”。對於這一暴行,以印刷出版工會的二十四小時罷工為首,在日本全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法西斯的壓迫,反而加強了國民的反對。

突出地站在这類國民攻勢前列的,仍然是官公廳的勞動者。對於蘆田內閣所規定的三千七百日元基準這種活不下去的工資水準,全官公廳各工會組成聯絡協議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轉入了要求五千二百日元基準的正式鬥爭。這次的鬥爭在以下三點上比三月鬥爭給政府以更大的壓力。

第一,通過三月鬥爭,親自體驗過民主化同盟幹部叛賣行為的國營鐵道工會會員,在五月底的奈良大會上從民主化同盟幹部手上奪回了領導權。過去作為中間派而成立的革新同志會(簡稱為“革同”),現在作為統一派而開始與共產黨相接近。國營鐵道工會在奈良大會上,擊敗了民主化同盟的提案,同意進行地區鬥爭,並通過了重行參加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決議。甚至在民主化同盟中綽號叫做“堅持二千九百二十日元基準佛爺”的、擔任薪給對策部長的蓮見太一,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也落選了。但因日本政府立即把蓮見任命為人事院俸給科長,這就充分証明了民主化同盟和政府間的密切關係。於是在三月鬥爭中,由於民主化同盟幹部的領導而未與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

議會採取一致步調的、擁有六十萬會員的國營鐵道工會，重新和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合作，大大地加強了鬥爭的力量。

第二，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所提出的要求中，附有六項條件：不改定物價，取消大眾徵稅，不設立處理紛爭的機關，不實行解僱員工的行政整理，不製定最高工資制。這些條件是具有動搖日本國內國外壟斷資本基本政策的政治意義的。一開始就使經濟鬥爭同時具有了政治鬥爭的意義，這表示全官公廳勞動者已比三月鬥爭時大大成長了。

第三，外部的援助，比三月鬥爭的時候，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都有飛躍的發展。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除日本工會總同盟以外，國營鐵道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全官廳職員工會協議會、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日本工會會議、全國煤炭產業工會、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等大部分工會，組成了反對提高物價的聯合鬥爭委員會，強有力地支持了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鬥爭。而農民、學生、中小工商業者鬥爭的高漲，以及工農聯絡會的成立，也大大幫助了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的鬥爭。

政府頑固堅持三千七百日元的基準，致使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的談判趨於決裂；於是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根據七月一日才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於七日向中央勞動委員會申請調停，從八月八日起獲得了爭議權。政府藉口這項要求是政治要求，破壞了片山內閣時自行製定的公務員法，不接受此項提訴。於是這就引起了包括社會黨正統派在內的工農議員團對政府的激烈攻擊。因此，使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幹部，已完全沒有活動的餘地了。在三月鬥爭時是政府中主角的西尾末廣，因政治獻金問題已被迫辭職了。勞動大臣加藤勘十由於民主化同盟勢力的衰退，已無計可施。政府終於屈服下來，從八月四日起出席了調停委員會。而且政府一步步地受着工人方面的壓力，不得不

在八月十七日表明，根據集體談判的結論，勞動條件應由國會決定。這就意味着，用低工資基準束縛全體勞動者的美日壟斷資本的最大基本政策，已陷入不得不由日本政府親自推翻的危險境地了。

這時候，就由麥克阿瑟發出了在日本法西斯主義歷史上，標誌着一個新時期的文件。這就是他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首相蘆田的信件。這封信的主旨是應立即整個修改三週前才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法。其理由是，爲了“使公共（全體）利益高於一切”起見，認爲賦與國家公務員以集體談判權、爭議權是不適當的。蘆田內閣便活躍起來，採取“麥克阿瑟信件是高於一切法律”的解釋，立即否認了中央勞動委員會的調停。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用日本政府名義公佈了第二〇一號政令，並即日付諸實施。而這個政令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勅令第五四二號這種在新憲法實施後業已無效的“天皇命令”，來剝奪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和爭議權。

如果不賦與爭議權，則憲法所保障的團結權就失去了它的意義。況且，既沒有爭議權，又沒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那就不過是一個請願機關而已。全官公廳所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總數達二百六十萬人，佔日本有組織勞動者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所以它在戰後日本勞工運動上，曾起過最重要的作用。現在却從官公廳勞動者的身上，一舉而剝奪了他們爲憲法第二十八條所保障的勞動者的權利。這是第一次公開地否定了憲法的條文。並且，剝奪一部分勞動者的應有權利，就是削弱其餘勞動者的力量，也就意味着是從全體勞動者身上剝奪了一部分權利。而剝奪勞動者的權利，就是削弱國民的力量，也就意味着是損害了全體國民的基本人權。所以，日本是向法西斯化的道路大大邁進了一步。

這即使在美軍總司令部的政策上，也是一個急遽的轉折點。並且這由下述事實可以充分來證明它。即在二·一總罷工後掌

管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的勞動科長凱倫，雖然主張為培養民主化同盟至少應保留集體談判權，但這一主張未被接受，他竟不得不因此去職。關於這時期的情形，直接受過美軍總司令部勞工政策訓練的勞動省勞政科長飼手，曾談稱如下。

“在二·一總罷工後凱倫擔任勞動科長的時期，是等待自主的（民主化同盟系）工會發展的時期。這種政策，以麥克阿瑟的信件為轉機而不得不有所改變。也就是說美軍總司令部放棄了它所耐心等待的發展。至於它的原因，可以舉出來的，第一是極左分子的活動，第二是國際情勢。有鑑於現在和將來的狀況，美國也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政策了。”（勞政研究所：“現代勞工運動的動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這就雄辯地證明了：在七月攻勢中高漲起來的日本國民的政治覺醒，在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為中心的美國遠東政策的破產，在必然要引起柏林（封鎖）問題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削弱；遂使美國命令佔領下的日本急遽地轉向法西斯化了。

### 第三節 走向殖民地化的日本

#### 一 文化、教育的殖民地化

日本的法西斯化，由於公佈第二〇一號政令而結束了它的準備時期。

在公佈第二〇一號政令以後，就露骨地開始了殖民地式的鎮壓。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假借誹謗佔領軍的名義，美軍地方軍政部逮捕了包括共產黨候補中央委員佐藤佐藤次在內的新潟縣日本農民協會統一派的幹部。八月十一日發表了福井的軍政部代表控告共產黨員野坂參三違反佔領政策的事件。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拒絕地方勞動委員會的仲裁、在日本官方援助下

想強迫接收砧製片廠的“东宝”經營者方面，看出了無法擊破在各工会支援下的日本電影戲劇工会的防綫；於是請求美國第八軍直接加以干涉。美國第八軍於是出動了戰車八輛和一個中隊的兵力，还用飛機在空中進行恐嚇；同時並指揮備有裝甲汽車的一千八百名武裝警察，執行了对“东宝”電影製片廠的臨時处分（勞動省，一九四八年度“資料勞工運動史”）。这种压迫的殘暴，據女演員赤木蘭子說：“只剩下軍艦沒有派來”；東京民報報道这种暴力鎮压的情形甚至說：“而且对手既非暴徒也非無賴，却是夾有女演員在內的電影工作者。以这种人爲对手还如此嚴重，那末，如果礦山等發生罷工時，恐怕只有使用原子彈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不僅是对“东宝”爭議，对其他重要產業的爭議，美軍總司令部也都直接加以干涉。例如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命令電氣工人中止罷工，九月十日对全遞信从业員工会，九月十三日对電氣產業工会爭議發出強硬的停止爭議的“劝告”等，就是它的例証。此後，在“產別”所屬工会的罷工中，沒有受美國佔領軍干涉的倒反而屬於例外了。

在意識形態方面，也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開闢了道路。在日本投降後，立即開始了的、在文化和思想方面基於美國主義的愚民政策，在這個時期中達到了它的頂點。与此同時，一面藉着普及世界主義思想來消除日本民族的自覺，一面藉着動員以天皇制爲首的一切反動勢力開始努力鼓吹民族主義，來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意識製造温床。

在電影方面，剛一投降時曾輸入日本的若干反法西斯影片已不見踪跡，而到处都是宣揚色情、怪異、荒誕故事的影片，特別是表現資本主義末期症狀的強盜片和恐怖片。

在廣播方面，“山崗鐘聲”的作者菊田一夫發表文章說。——“日本廣播協會的廣播節目从投降後一直到現在爲止，日本人幾乎是毫無自由的，用我們的習慣語來說，这是美國佬的節目”。節

目中像專談常識的“談話資料”、利用社會佳話宣傳轉變風氣的“左鄰右舍”、專門宣傳完糧納稅義務的“農民之夕”、專門以民主化同盟工會為對象的“工會時間”等，都是由美軍總司令部廣播科所計劃，而用日本廣播協會計劃的名義來廣播的。至於不遵從指示的人，則不斷被降職或被開除。以流浪兒問題為廣播題材的“山崗鐘聲”，曾獲得社會上的好評。後來美國佔領軍強迫菊田一夫繼續寫作，並以命令的口吻詢問菊田：“你知道波茨坦公告嗎？”對於一九四八年秋天起美國佔領軍的擁護封建制家族制度的方針，菊田說：“我（菊田自稱）切身感覺，終於成為從事民主主義教育的孤兒了。失去熱情的作者所寫的‘山崗鐘聲’，從這時候起就變成僅僅以娛樂節目為方針了”（“山崗鐘聲的前後”，“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臨時增刊號）。

美軍總司令部特別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自一九四六年一月發表“關於教育的根本改革備忘錄”以後，美軍總司令部雖然經常說，用教育改變日本國民的思想正是佔領政策的重要目標，但是這裏所謂“民主主義”教育是什麼性質的東西呢？

據菊田一夫說：“從當時到佔領軍統治結束時為止的七年間，比什麼都嚴格的似乎是對教育廣播節目的方針。當時美方所使用的作為對學校廣播稿的資料，因為它和一九二〇年時對美國黑人兒童的教程幾乎完全相同，所以連我們這種不懂教育的人也覺得其中有些地方頗為可笑。不知是不是為了此事，總之日本廣播協會教育科的三位科長，都是因為違反民間情報教育局的方針而被免職的。”（見“山崗鐘聲的前後”一文）

從一九四七年起在教育方面就開始強制施行美國式的六三三四制<sup>①</sup>。於是放棄基本課程的學習，把重點放在名叫社會科，但內容並非研究社會的基礎而是藉着家族組織即係國家組織縮影

① 即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大學四年的教育制度。——譯者

的这种非科学原则，其目的在於从課程方面模糊階級認識。並且还强制使用从未听說过的“核心課程指導制”方法，强制实行地區教育和興趣本位的实用主義等等，來徹底進行殖民地的愚民教育。因此國民激烈地批評說：“六三制只能練好棒球”。事實上，根據一九四八年全部學生程度調查結果看，小學生的國語和算術程度，至少要比戰前差兩三年（參攷刀江書院出版、矢川德光：“对新教育的批判”）。

不僅如此，民族教育也被破壞了。在國語讀本中，刪去了具有民族特徵的古典民主文學的教育；在高等學校以下，不教授日本的歷史和地理。天皇的家庭親自示範，從一九四七年四月起，讓美國婦女瓦伊寧夫人擔任了皇太子的帝王教育。於是與普及從屬於美國的世界主義教育同時，促使作為法西斯主義基礎的民族主義復活起來了。一九四六年八月發行的日本歷史國定教科書，在敘述“國家的發展”中，把日俄戰爭和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分別寫成爲“由於意見的不一致”和“因鐵路突被炸毀，於是爆發了事變”，藉圖隱蔽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同時還承認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實有其人，仍然把以天皇和統治階級爲中心的、反民主的、排外主義的歷史來教給國民（井上清：“國家發展的批判”）。

至於標榜爲“民主主義”的、新學制高等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則是在一九四八年夏開始編輯而在十一月發行的。把這種教科書當作新學制高等學校、教師、國民，特別是當作返國日人的思想教育讀本使用後，認爲比美國出版的還要好些，於是遂把它翻譯成英文，並分發給美國佔領軍的全部士兵（估計印數當在二百萬到五百萬冊）。這種教科書的內容是矛盾已極的“理論”。舉其顯然可見的說：第一，它從民主主義中抽去了民主主義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民族獨立這一決定性的因素；第二，它抹殺了爲歷史上、理論上所充分證明了的關於民主主義的最重要的結

論——爲實現民族獨立和民主主義，不能僅僅依靠改革，必須實行革命；第三，它認爲“爲了公共福利”，必須剝奪個人的權利，特別是工人的罷工權。這就明顯表示，這裏所謂“民主主義”，是與法西斯主義一脈相承的；第四，它認爲在“人口過剩”的日本，除依靠低廉工資進行傾銷輸出外別無生存途徑，藉以復活日本帝國主義過去的“理論”；第五，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所證明的一樣，站在最前綫和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是共產主義，但它卻把共產主義稱作“極權主義”，並不顧共產主義是民主主義的最高發展形式這一在理論上和歷史上所充分證明了的事實，而主張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對立的東西；第六，正像世界上一切法西斯主義者所說過的一樣，它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壓制少數剝削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現實的民主主義方法，故意加以隱蔽，並把階級專政說成是個人獨裁（井上清：“對文部省著的‘民主主義’的解說和批判”、“歷史教育論”）。

這一套所謂“民主主義”的原理，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舉行教育委員選舉時，曾對日本國民廣泛進行宣傳並名副其實地加以實行。在教育委員的選舉中，雖然教員工會代表全國教師的意志，爲使教育民主化，曾在各府縣提出工會的競選人，但美軍總司令部通過地方軍政部，認爲教員工會的競選人違反“教育民主化”原則，強硬“勸告和鼓勵”他們退出競選。據東京的競選人金子靈岳作証說，如果不退出競選就必須甘願斷絕收入的來源，還要受一切可以想像的壓迫，這“真是懇切而懇懇的勸告”。因此，教員工會推出的競選人，除兩名外都不得不退出競選。而對始終未曾退出競選的金子靈岳和埼玉縣的阿部綱義兩人，以及對於共產黨和民主主義統一戰綫所推出的競選人，就由美軍各地方軍政部中與教育有關的官員，更發動了“頗爲懇切懇懇的”使他們落選的運動。各地方軍政部中與教育有關的官員命令各校校長召開“家長教師聯誼會”大會，對到會家長和一般市民（曾特

別命令一般市民參加這種大會)進行了反蘇反共的“民主主義”宣傳。當有人質問“這可以認為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嗎?”則有時回答說“這是強有力的勸告”,有時也就乾脆答覆“這是命令”(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金子靈岳在共立講堂的演說)。此外,對於儘管在這種壓迫下而仍然當選了的東京的堀江邑一(共產黨)、埼玉的阿部綱義,則正如預定的那樣,在他們當選後仍加以各種壓迫。當他們反抗這種壓迫時,終於採取最後手段,把這兩位國民的代表加以整肅。這就徹底証實了美國的“民主主義”是什麼東西了。

日本政府受美軍總司令部這種政策的鼓勵,開始迅速轉向法西斯的道路。以下事例都是其具體表現,例如把麥克阿瑟的信件當做命令;聲明第二〇一號政令不違反憲法(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內閣官房長官聲明);指令立即檢舉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者(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檢察總長的指令);發出通告,剝奪官公廳各工會的爭議權和集體談判權,否認集體合同和專門從事工會工作人員的地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內閣閣議決定);擴大解釋第二〇一號政令,把私營企業對公教人員的同情罷工,適用刑法第六十五條的共犯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次席檢察官會議的聲明);蘆田首相發表談話,說是正在考慮整肅共產黨員擔任公職(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招待外國記者時的談話);搜查共產黨的地區事務所,以便當做違反二〇一號政令的旁証(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以後在各地進行搜查);發出通告,說是工會排斥共產黨職員並不違反勞工法規(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勞政局長賀來的通告)等等。

## 二 民族獨立青年行動隊

但是,從第二〇一號政令就開始了的、這種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階段,也促使日本國民的民族自覺和保衛民主主義的鬥爭

進入了新階段。

一九四八年七月底，全遞信從業員工會、國營鐵道工會發表緊急事態宣言，立即表明了和第二〇一號政令進行鬥爭的態度。國營鐵道工會松山機務段分會的乘務員，為反對強制實行用一名乘務員的、這種等於是殺人的新調配車輛辦法，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通過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決議，八月四日開始停止火車的行駛。八月五日，該分會為反對鐵路當局罷免該分會會長、副會長等四名的命令，立即舉行無限期罷工。而在日本政府援用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名義拘捕了十名領導分子後，仍使四國西部的鐵路運輸停頓達一星期之久。在這次鬥爭中，大阪、廣島等機務段雖然接到業務命令要他們破壞罷工，但他們卻拒絕服從這種命令。並且松山的日本農民協會支部，也以大批糧食贈送給罷工團體表示同情；這就表示儘管這一鬥爭比其他工會早走了一步，但它已不是孤立的鬥爭了。所以，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當北海道的兼松煤礦工會要求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反對公務員法，斷然實行二十四小時罷工時，這一問題已經不僅是全官公廳勞動者的問題，而成為日本全國人民，特別是全體勞動者的問題了。這些情形就証明了日本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已經成長起來了。

日本在佔領下第一次的民族反抗，也是這時候開始的。這種民族的榮譽，在地區方面應歸之於北海道，在階級方面應歸之於工人階級，在年齡方面應歸之於二十歲年代的青年。

貫穿北海道狩勝峯的狩勝隧道是一個斜度千分之二十五的陡坡，加以通風設備不良，所以通過這個隧道時列車乘務員不斷發生窒息、火傷的事故。國營鐵道工會旭川支部新得機車區分會，自成立以後，雖然用集體談判辦法要求改善通風設備，減少貨運列車等，但卻未被接受。於是該分會根據違反勞動基準法為理由向當局申訴，同時從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起實行減少貨

遲列車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儘管勞動基準局調查團和鐵道省調查團在調查中親身遭受了窒息和火傷的危險，但仍不接受分會的要求，反認為分會的鬥爭是“非法的爭議行為”而施以壓迫。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分會鬥爭委員長柚原秀夫“為促使殘虐當局的反省”，在隧道入口的鐵路線上投身自殺。分會會員為紀念這一殺身的抗議，把狩勝隧道改名為柚原隧道，並繼續進行減少貨運列車百分之三十的鬥爭。而工會本部也正式承認了分會的爭議權。

第二〇一號政令就是這時公佈的。公佈當日（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即命令新得分會停止減少列車百分之三十的行動。新得分會遵照命令在第二天，即八月一日開出的、未減少車次的第一班列車，當進入隧道時，立即有兩名機車助手發生了窒息。上邊命令他們去死，但是他們又無法進行為了生存的鬥爭，因為現在他們被剝奪了唯一的武器——爭議權。八月五日，參加乘務員會的分會會員，通過了用實力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以保衛民族獨立的決議。並由分會中的五十九名青年組成“民族獨立柚原青年行動隊”，他們在柚原墓前宣誓要鬥爭到底後，就分赴各地活動。於是，他們在國營鐵道分會中、在工廠中、在農村中，為呼籲民族危機而開始從事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這項運動立即以旭川支部為中心，擴大及於北海道一帶的國營鐵道工會。到八月二十日為止，脫離職務者達一千三百六十一名，因此不能行駛的車輛達一千輛左右，不能搭車的乘客達六萬名左右，使北海道的鐵路運輸陷於停頓狀態。

官方一面把這些青年行動隊當做違反第二〇一號政令者給以免職或其他處分，同時還蹂躪憲法發出沒有填寫姓名的空白拘票來逮捕這些行動隊員。但是，這些行動隊員，在日本國民的援助下逃避了官方的追究。從八月下旬起，他們渡津輕海峽南下，勇敢地向全國呼號民族的危機。這種放棄工作崗位的鬥爭

方法，作為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鬥爭方法，雖不免受了做得過火的批評，但這並不能掩蔽它把民族危機在國民面前尖銳地暴露出來的偉大功績。

與此相呼應，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的青年工人中，也出現了放棄工作崗位的人。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本部更把這種戰術發展起來，實行了“霖雨戰術”（這是一種似斷似續的鬥爭方法，即個別實行放棄工作崗位、進行工作場所鬥爭和部分罷工等）。私營企業的全日本機器工會、全日本鋼鐵產業工會、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等，也進行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鬥爭。工農聯盟也前進一步，甚至出現了下面的例子。即電氣產業工會的豬苗代發電廠的工人，以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去親自着手解決農民問題中心環節的土地問題。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日立支部舉行了反對第二〇一號政令的二十四小時罷工。因為官方對於這個全遞信從業員工會支部和支援它的工會、共產黨加以鎮壓，於是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了市民大會表示抗議。在市民大會開會時，武裝警察事先未作警告，忽然從羣眾背後進行襲擊，揮舞警棍、六尺棒，使包括老太婆、主婦、兒童在內的一百多市民受輕傷和重傷。“當時附近一家魚店的老大爺，氣得變了臉色跑到我們面前。只見他脇下夾着五、六把菜刀，並把菜刀遞給我們說：‘喂，你們橫遭這種毒手，我豈能坐視不管。我借給你們這些傢伙，和他們拚吧。’大概數百名的目擊者都和這個老大爺有同樣的義憤。但是我們以感謝的心情婉拒了這位老大爺的援助。老大爺帶着不解的神情退回去了”（引自全日本機器工會日立分會的菅原和夫的筆記：“官方的暴行”）。這如果在一九五二年會如何呢？我想大概會使老大爺滿意而退的。一九四八年，工人和市民在挨打下退却了。但是，即便在一九四八年，工人階級還是立即進行了反擊，把真相訴諸於全體市民，並舉行了代表日立全市

的二万五千人羣衆的大抗議集會，致使从茨城縣一帶調來的數千名警察隊駐守在日本市不能離開。

繼續壓“东宝”電影製片廠之後的這種对日立的鎮壓，引起了國民各階層的反法西斯運動。於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組成了幾乎包括所有民主團體在內的擁護民主主義同盟準備會。九月，東京葛飾區的五千名家庭主婦蜂擁至區公所進行鬥爭，高呼“如果有錢養警察，就拿米來”。此外，主張“研究的自由”和“反对復活法西斯殖民地教育”，並為此進行鬥爭的學生們，組成了名為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簡稱“全學聯”）的全國性組織（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作為他們的核心鬥爭機關。

由於國民的這種抵抗，使福井縣放棄了控告野坂參三的企圖，使大阪撤回了公安條例。並且這使蘆田內閣修改勞工法規和整肅共產黨員任公職的企圖也未能實現。由於日本國民的抵抗；日、美壟斷資本想急速把日本導入法西斯主義的野心，遂暫時被粉碎了。

### 三 政治腐敗、第二次吉田內閣、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但是，在日本國民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前，統治階級已自行暴露了它的醜態。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蘆田內閣崩潰了。

成為蘆田內閣崩潰原因的昭和電工事件，是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統治本身所產生的政治腐敗的典型例子。

只要是脫離了人民權力的統治，諸如專制統治和殖民地統治，當然是政治腐敗的最好的溫床。美軍總司令部的官員，不論是高級的或低級的，都熱烈地要求和歡迎現款、利權以及日本畫、古董、珍珠等日本珍品，特別是日本婦女的肉體。由於日本統治階級的戰犯、政治家、官吏、資本家們，從親身的體驗中競相

提供這類賄賂，於是也就加深了這種腐敗。舉例來說，一九四八年珍珠的價格之所以不僅是急劇暴漲，而且從市場中消失了蹤跡，就是由於在一萬田總裁下的日本銀行進行收買的緣故。至於這些東西送到哪兒去了，大概是不問自明的（“廣場”雜誌，一九四九年第一號）。

昭和電工事件的主角日野原節三，在“有了女人和金錢就可以統治天下”的信念下，正如起訴書中所說，他“經司令部當局的推薦”，一九四七年三月就任昭和電工（壟斷日本肥料生產額百分之八十的公司）的經理，他所使用的行賄、應酬費，僅已查明者已達七千萬日元，而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他所獲得的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則達三十億零八百萬日元。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是國家和壟斷資本直接結合的典型表現。這種貸款是以復興產業的名義，用國家貸款的形式，實際上就是壟斷資本家不負歸還義務把國民稅款飽其私囊的制度。如果這種地方不產生腐敗現象，那等於說是污泥溝中不會生蛆了。實際上，從復興金融公庫所獲得的貸款，其中百分之四十到八十必須用作收買費，這已成為當時資本家的常識了。因此，在昭和電工事件上所判明的二千餘名有關人物中，上自興業銀行總裁、經濟安定本部長官、副首相西尾、首相蘆田；下至警視廳監視被拘留者的警察、大學出身的官吏，都包括在內。政黨方面，除共產黨以外，民主自由黨的大野伴睦、小澤專七郎；民主黨的蘆田、栗栖，社會黨的西尾末廣，幾乎一切政黨都與這一事件有關係。甚至從調查這個事件的司法官起到日本官方禁止從事調查的絕對權力最高層止，也就是說整個控制日本國家的機構，都已腐敗透頂，都接受了日野原和他的姨太太秀駒的錢財等物（實際上是國民的稅款）。

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幾乎全被像昭和電工所代表的那類壟斷資本分掉了。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復興金融公庫的貸款中，分給全國五萬家中小企業的貸款額不過是二十億日元（佔

總額的百分之二·三)；与此相反，三井礦山公司得到了三十億一千五百万日元，三菱礦業公司得到了十九億五千万日元，这种貸款是集中地給与壟斷資本了。由於以德田球一為重要委員的“非法財產处理委員會”的追究，与昭和電工事件有關的腐敗現象的暴露，產生了使第二個、第三個以至一切壟斷資本和一切國家機構的醜惡交易都在光天化日下被暴露的危險。於是，作為与昭和電工事件的有關者，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傳訊了經濟安定本部長官栗栖，十月五日逮捕了副首相西尾，並且顯然要波及到首相蘆田，甚至牽涉到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次長凱德斯的名字。於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貴特用電話詢問：“為什麼不釋放日野原”，以此為首，美軍總司令部遂開始進行強硬干涉。結果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遂使蘆田內閣被迫辭職了(井上清：“日本政治腐敗史”及參照“文藝春秋”月刊，一九五二年臨時增刊号的“烏尾夫人的生活和意見”、“秀駒這個女人”兩文)。

但因為中間道路政治不是直接由於人民的压力，而是由於它的內部腐敗崩潰的，所以这使保守政党仍有組成後任內閣的可能。

於是以後任內閣問題為中心，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兩派勢力的对立。一派是企圖組織以山崎猛為首揆的民主自由党、民主党、國民協同党、社会党右派的全國聯合內閣的運動；一派是企圖組織以吉田為首揆的民自党中心的單獨內閣的運動。這兩派的对立是分別以民政局的凱德斯和諜報部的韋洛比所代表的美軍總司令部兩種勢力為背景的。但是，它們在压制以共產党為中心的民主勢力的抬頭和企圖維持正在崩潰中的國內國外壟斷資本的統治這一點上，是站在相同的立場的。只是為了維持它們的統治，究應減輕右翼的色彩以緩和國內國外的反对，还是用露骨的右翼“強硬政治”來突破危机這點上，它們对应选取那种手段还有着矛盾而已。

結果，後者獲得了勝利，於是成立了第二次的吉田民主自由黨的單獨內閣。

吉田之所以獲得勝利，其原因如下。第一，由於從柏林問題進入到北大西洋同盟談判後美國壟斷資本的危機，特別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所造成的美國遠東政策的破產，加上中間道路政治的失敗，遂使美國政府日益感覺有在佔領下的日本組成“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實際上，後邊要說明的“經濟安定九原則”<sup>⊖</sup>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表了；又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命令凱德斯返回美國去了。第二，由於“遠東兵工廠”的政策，積極地促成了日本反動勢力、特別是壟斷資本的復活。一九四八年三月被指定為經濟力過度集中的企業（壟斷企業）的三百二十五家公司（佔日本全國股票的三分之二以上），從五月到十一月，除一百家以外，全都解除了它們的指定。並且對於餘下的一百家公司，也保證它們不必擔憂會被完全解散。結果，只有二十八家公司在形式上加以分散或被吸收入新公司中。這一面提高了壟斷資本的自信，一面起了加深它的買辦性的作用。代表這種壟斷資本意見的一萬田日本銀行總裁，當蘆田內閣垮台時，曾熱烈希望“加強國內的政治力量”（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招待新聞記者的談話）。第三，民主自由黨在三月組成該黨時，把舊自由黨時代的純自由經濟政策曾加上若干統制經濟的色彩。五月以該黨名義首次發表了勞動對策（包括修改、停止勞工法規及禁止公共和重要產業的罷工）；五月和七月又主張實行行政整理（先行裁員百分之二十五）等，開始積極主張這類迎合已發動攻勢的壟斷資本的心意的政策。而吉田所主張的保守聯合、強有力的單獨內閣，是完全符合日、美壟斷資本的期望的。

⊖ 所謂“經濟安定九原則”是由麥克阿瑟的經濟顧問、美國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為日本製訂的如何使日本經濟進一步殖民地化與軍事化的方案，所以也稱為“道奇方案”或“道奇路線”。——譯者

第二次吉田內閣組閣時，因為保守政黨意見不能一致，於是除從民主自由黨本身外，只從參議院的綠風會中遴選出數名閣員後就粉墨登場了。正因為吉田是以頑固出名的，所以會傳說他比片山、蘆田的“諾諾連聲”之輩也許敢於和美國佔領軍相抗爭；但他的所謂頑固祇是對下的官僚性頑固；至於對上，即對於美國的權力，則必然是徹底的卑屈和服從。並且吉田根據最反動最具買辦性的二次世界大戰後附屬國的原則發表談話說：“共產黨人雖然說日本是殖民地，但美國以前不也是英國的殖民地嗎？”（吉田招待外國記者的談話，載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英文“日本時報”）這種話對於熱愛民族獨立的日本國民說來，是永不能忘的、徹底的、賣國賊的言論。

第二次吉田內閣，在美軍總司令部的支持之下，打算把第二〇一號政令完成立法手續後再舉行大選，於是連施政演說也未發表就向議會提出修改國家公務員法的方案。這法案得到保守政黨的贊同，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經國會通過了。因此，剝奪國家公務員的爭議權和集體談判權的第二〇一號政令就完成了立法手續。這時候，社會黨幹部看到工人階級的激烈反對，於是放棄了它在與黨時代所親自製訂的原案，提出了僅僅保留集體談判權的修正案，仍想藉此維持它的工人政黨的招牌。但是沒有爭議權的集體談判權，就和沒有填入火藥的砲彈殼是一樣無意義的。於是在十二月，社會黨正統派議員放棄了社會黨整黨運動的念頭，並和國有鐵道工會的革新同盟，日本農民協會的正統派同志會等共同組成了名為勞動者農民黨（簡稱“勞農黨”）的這一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中間政黨。但是那些代表着國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深切不滿、以及意識到如果在國際和國內不以共產黨為中心就不能挽救民族命運的社會黨最左派和一時加入了勞農黨的人們，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起，當做所謂社（會黨）共（產黨）合作陸續參加了共產黨。於是右翼社會民主主

義的勢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的勢力顯著增大了。

在這時期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的審判結束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宣佈了判決。東條、廣田、土肥原、板垣、松井、武藤、木村七名被處以絞刑；木戶、平沼、荒木、小磯、島田、畑、白鳥、梅津等十六名被處以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和重光葵分別被處以二十年和七年的徒刑。

連審判長韋勃也認為是在戰爭中曾起決定性作用的天皇、以及和天皇、軍部、政治家們同樣負有重要戰爭責任的壟斷資本家，竟無一人被起訴，因而也未受任何處分。其所以如此，正如美國的首席檢察官季楠的証言一樣，乃是出於美國的決定。雖然在這一點上使戰犯審判的反法西斯性質為之大大減色，但即使如此，這在當時仍不失為是對於企圖發動戰爭從事法西斯統治者的一大實際教育。

但是，這種實際教育却被統治階級完全相反地來利用了。在執行絞刑的翌日，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皇大概是為了表示謝意，特別會晤了檢察官季楠。這時，天皇通過季楠，當面交給他一封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信中說：“我願為使美日關係達到最親密的程度而竭盡全力”（據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美聯社電）。這就是日本統治階級的“象徵”（指天皇——譯者），親自表明了他的買辦性質。並且就在同一天，美國政府以美軍總司令部司法局長的名義，發表甲級戰犯的处理業已結束，其餘被告一律釋放，表明了和日本舊統治階級攜手合作的態度。之後，戰犯不僅是接連地被釋放，且不久就到了戰犯被重用的時代。於是日本就不斷地向着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前進。而日本國民為了表示不滿，甚至作打油詩諷刺說：“所以東條說，我真是倒霉啊”。